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BRAVE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在全球有 1 百多万人参与的运动，致力于缔造一个人人均享有人权的世界。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标准中列载的所有权利。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资金主要来自成员会费和公众捐款。

© 国际特赦组织 2017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件的内容已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4.0 国际）获得许可。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legalcode>

如欲查询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有关“许可”的网页：www.amnesty.org

若某一材料的版权属于国际特赦组织以外的持有人，则该材料不受制于知识共享条款。

2017 年首次出版

国际特赦组织有限公司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K

索引号：ACT 30/7270/2017

原文：英文

amnesty.org



封面图片：活动人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门参与集会，抗议报纸编辑兼批评强硬派印度教团体的人士高丽·蓝克希 (Gauri Lankesh) 在 2017 年 9 月 5 日于卡纳塔克邦被杀。© SAJJAD HUSSAIN/AFP/Getty Images

**AMNESTY
INTERNATIONAL**



目录

1. 概要	5
2. 人权捍卫者为何成为打击目标	8
2.1 因所做的工作而遭袭击	8
高风险的职业和活动	10
2.1.1 新闻工作和言论自由	10
2.1.2 环境、领土和土地使用权	11
2.1.3 劳工权利	13
2.1.4 人权律师和其他司法领域工作者	14
2.2 因身份而遭袭击	15
2.2.1 女性人权捍卫者	16
2.2.2 同志权利捍卫者	17
2.2.3 人权捍卫者和性工作	18
2.2.4 原住民和非洲裔维权者	19
2.2.5 其他受歧视群体的捍卫者	21
2.3 特定背景下的袭击模式	22
2.3.1 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	22
2.3.2 有组织犯罪和广泛的暴力	23
2.3.3 暴力镇压和平抗议	24
2.4 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受到的对待	25
3. 人权捍卫者被杀害和强迫失踪造成的持久影响	28
3.1 对家人和朋友的影响	28
3.2 对其他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的影响	31
3.3 将绝望化为实现变革的力量	33
4. 防止更多袭击：确认模式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36
4.1 承认和保护人权捍卫者的责任	40
5. 结论和建议	43

1. 概要

当人权捍卫者遭受杀害或强迫失踪，而犯罪者不受惩罚时，当局所发出的信息是蔑视所有人的人权。

人权捍卫者在维护自由、正义和尊严原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以上 3 项原则也是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人权捍卫者的工作直接有助于实现人权、加强法治和促进可持续发展。1998 年，国际社会承认这些公民社会行动者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时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简称《人权维护者宣言》。《宣言》强调，承认和保护人权维护者是确保他们能在安全环境中工作的关键。

尽管如此，自从《人权维护者宣言》通过近 20 年以来，全球各地的人权捍卫者受到骚扰、恐吓、虐待、限制、不当起诉和拘押等不同形式的打击，且情况持续至今。数以千计的人权捍卫者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杀害或强迫失踪，他们不但不被承认和保护，而且被描绘为罪犯、不受欢迎的人、“外国代理人”、“反国家者”和“恐怖分子”，并被说成是对发展或传统价值的威胁。此类标签极具破坏性，并为进一步侵害行为（可能致命）开绿灯。政府、武装团体、公司和其他有权有势的参与者正在对人权展开正面攻击，力图使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噤声，并阻碍和惩罚他们。

本报告重点叙述了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最严重侵害行为：杀害和强迫失踪。这类袭击背后的动机是多种多样。有些人因为他们的合法活动而遭袭击，例如，当他们挺身反抗强大势力，分享信息和提高认识，或与歧视性的公众舆论和社会规范对质时；其他人因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身份而遭袭击。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对待的人权捍卫者遭受袭击的风险更高，包括那些捍卫女权；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权利；以及原住民和少数群体权利的人。他们经受的暴力和歧视可能是基于性别、身份和其他因素。其他人则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袭击，例如在冲突期间，或社区受到有组织犯罪控制和暴力镇压时。

本报告叙述了不同的个案，这些个案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如果各国均严肃对待其人权义务，并在收到有关威胁和其他侵害的报告时认真行事，那么就有可能可以阻止大多数袭击发生。本报告概述的案例显示，杀人和强迫失踪事件总是在一系列警告和之前出现的各种袭击后发生：它们是“事先张扬的杀人事件”。¹ 在全球众多国家，当人权捍卫者谴责威胁时，各方几乎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一般来说，当局没有对威胁进行彻底调查，威胁和袭击也未明确受到公开谴责。各国的所作所为或不作为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人权捍卫者是认可的打击目标。

人权捍卫者被杀害和强迫失踪造成涟漪效应，触及朋友、家人、其他人权捍卫者和整个社会，影响所及远远超出受害者本身，更造成心理创伤和实际困难，并向其他人发出令人不寒而慄的信息，让他们对争取人权却步。而在这些罪行不受调查和犯罪者未受惩罚的情况下，所有人权捍卫者面临的风险水平都会上升。由于他们受到恐吓并被禁止开展工作，致使人权受到侵犯的个人和社区无法发声和不受保护。与此同时，家人、朋友和其他人权捍卫者都感到愤慨，有着不可压抑的渴望，意欲寻求正义和真相。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许多人继续就所遭受的伤害要求获得保护、正义及适当的赔偿，并继续要求立即作出改变，以确保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和有利的环境。

本报告最后对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议。国家对捍卫人权和保护人权捍卫者负有最终责任。除了所有机关和人员尊重和保护生命权外，各国还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并确保问责，如通过尽责行动来防止

¹ 取自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81 年的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名称。

非国家行为体任意剥夺生命。在这方面，其中的关键是以预防性行动，处理各种个人威胁、已知的侵害模式，以及可能导致危险的情势处境。此外，各国必须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而且向受害者提供适当的补救措施和赔偿。针对维权者的袭击必须受到公开谴责，政府应公开发出明确的信息，表明不会容忍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至关重要，各国应公开承认人权捍卫者所起的关键作用，称许他们，鼓励每个人都成为人权捍卫者并亲自对抗不公不义的事。我们应感谢所有用生命勇敢捍卫我们的人权的人，以及那些不顾各种障碍和自身安危而继续坚持挺身维护人权的人。

研究方法

这份简要报告建立在国际特赦组织对维权者遇袭事件的记录之上，这也是该组织几十年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此外，部分信息也来自其他组织，而在报告里提到的这些组织中，有不少将重点放在声援和保护人权捍卫者。

2017 年，国际特赦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对象是维权者以及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南苏丹和叙利亚遇害之维权者的亲属和同事。其他证词来源于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组织就发生在孟加拉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叙利亚、土耳其、泰国和美国的案例且已经公布的访问。

本报告中的案例之所以被挑选，是因为它们阐明并揭示出全球维权者遭受杀害和强迫失踪的态势。当中一些暴力行为在较近期发生，另一些则发生在十多年前。所有这些都出现在《人权维护者宣言》通过以后，并展现全球不同地区暴力袭击的普遍态势。

清点受害者

要解决任何人权问题，第一步是要确认问题的严重程度，任何承诺解决问题的国家都应将其采纳为政策事项。然而，关于维权者遇袭（包括杀害）的次数和类型，却极少有公开的官方信息。

根据几个非政府组织和/或社区组织多年来收集的信息，估计自从《人权维护者宣言》通过以来，全世界约有 3,500 名维权者遭到杀害。² 真实数字可能会更高，这是由于当局一般没有记录和汇编人权捍卫者受袭击的事件，因此在这方面并无官方数据。当中一个关键的障碍是国家当局不承认受害者是维权者，因此没有在调查中考虑到袭击动机有可能是受害者的人权活动和身份。

人权捍卫者纪念网站：表扬那些因捍卫人权而遇害的人

2016 年 11 月，一个由前线卫士领导、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联盟推出了一个纪念网站，以缅怀自 1998 年以来所有因维护人权而遇害的人。在不少个案中，没有任何人因这些罪行被定罪，更甚者是无人被指控。

www.hrdmemorial.org

前线卫士是一个为保护面临险境的人权捍卫者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定期整理有关人权捍卫者在全球各地遇害之事件的信息。该组织在 2016 年报道，当年全球至少有 281 名维权者遇害，而且情况似乎越趋恶化：前线卫士在 2015 年记录了 156 人被杀害，而 2014 年的遇害人数则是 136 人。³ 同样地，欧盟人权捍卫者机制（EU Human Rights Defenders Mechanism）⁴ 针对人权捍卫者受袭击的事件，建立了一个实时监测警示平台，此外，许多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也定期发布有关此类袭击的资料。

² 其中一些人被包括在维权者纪念网站中，这是由一个人权组织联盟创建的网站和数据库，以表扬、展现和纪念在 1998 年以来遇害的维权者，<https://hrdmemorial.org/about-the-project/>。

³ 前线卫士，《2016 年面临险境的人权捍卫者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t risk in 2016），2017 年 1 月，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resource-publication/annual-report-human-rights-defenders-risk-2016。

⁴ 欧盟人权捍卫者机制是由一群非政府组织进行日常运营。欲了解更多信息，参阅 www.protectdefenders.eu/en/stats.html。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国家有义务防止对人权捍卫者遭的袭击，因此，作为履行该义务的一部分，各国应记录并公布有关此类袭击的资料，以便深入理解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

2. 人权捍卫者为何成为打击目标

许多人权捍卫者能够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而不用担心遭到报复。当人权捍卫者影响到强大利益集团，要求落实所争取的人权，或在危险环境中工作时，就往往出现和增加维护人权方面的个人风险与障碍，而这大多只是因为他们是人权捍卫者。

如果国家不能确保提供一个**安全和有利**的维权环境，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就会受到阻碍，他们面临的风险也会增加。各国有责任确保在其司法管辖下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可享有所有人权，包括促进和捍卫人权的权利。⁵ 要在实际上创造这种环境，必要的条件包括：

- 有利的法律、体制和行政框架；
- 具备诉诸司法的途径，并杜绝侵害维权者的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
- 强而有力和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
- 重视风险群体的有效保护政策和机制；
- 特别关注女性人权捍卫者；
- 尊重和支持人权捍卫者工作的非国家行为体；
- 安全和公开接触国际人权机构的途径；
- 强大和充满活力的人权捍卫者社区。⁶

2.1 因所做的工作而遭袭击

许多人权捍卫者之所以遭到袭击，是因为他们挺身反抗不公的法律和政府做法，分享信息和提高认识，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为人们提供关键服务，挑战歧视性舆论，并影响到强大利益集团。当他们呼吁落实人权，特别是在某些环境和国家里争取人权，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例如，在**拉丁美洲**多个地方，人们在寻求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和享受有关权利时受到严格限制，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捍卫此类权利的人如何遭到个人和官员抹黑、骚扰、不当起诉、威胁和人身攻击。⁷ 在**美国**，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提供者和行动者数十年来一直是抹黑对象，同时也是爆炸和枪击等暴力袭击的目标。⁸ **乔治·提勒**（George Tiller）是美国少数进行晚期堕胎手术的医生之一，在 2009 年 5 月于堪萨斯州被枪

⁵ 《人权维护者宣言》，1998 年，第 2 条。

⁶ 参阅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玛格丽特·塞卡格亚（Margaret Sekaggya），2013 年，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25/55。

⁷ 国际特赦组织，《捍卫者受到攻击！在美洲地区促进性与生殖权利》（Defenders under attack! Promot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in the Americas）（索引号：AMR 01/2775/2015）。

⁸ 全国堕胎联合会（National Abortion Federation），《暴力统计数字和历史》（Violence statistics and history），<https://prochoice.org/education-and-advocacy/violence/violence-statistics-and-history/>。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杀。他此前已是几次袭击的目标，包括被枪击、投掷炸弹和纵火。尽管如此，他继续确保妇女有权获得必要治疗，并保障她们的健康权。⁹ **计划生育联合会** (Planned Parenthood) 是一家提供性和生殖健康护理的全国性倡导组织，同样一直遭到抹黑，并几次受到国会和州当局的调查，更多次被人企图切断其资金来源。¹⁰ 2015 年 12 月，威胁和抹黑最终演变成人命损失的事件，3 人在前往该组织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诊所求诊后遭枪杀，之后一名男子被捕。

在**巴基斯坦**，5 名人权捍卫者在疑似被安全部队强迫失踪后，于 2017 年 1 月初下落不明。他们在线平台传播自己对巴基斯坦人权状况的看法，批评宗教好战势力和军事当局。学者兼诗人**萨尔曼·海德尔** (Salman Haider) 以及博客作者**阿西姆·萨伊德** (Asim Saeed)、艾哈迈德·拉扎·纳瑟尔 (Ahmed Raza Naseer) 和**瓦卡斯·戈拉耶** (Waqas Goraya) 在绑架发生逾 3 周后，据报已与家人团聚。巴基斯坦公民进步联盟负责人**萨马尔·阿巴斯** (Samar Abbas) 是第 5 名失踪的活动人士，于 1 月份最后一次出现在他工作所在的伊斯兰堡，如今命运和下落仍然不明。¹¹

巴塞爾·卡塔比爾 (Bassel Khartabil) 是一名人权捍卫者，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通过互联网在**叙利亚**促进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渠道。2012 年 3 月，他遭到叙利亚军事情报局拘捕，被与外界隔离地监禁 8 个月，于 2012 年 12 月被转到一所监狱。他一直被关在那里，至少持续到 2015 年 10 月，当时他告诉家人自己将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那也是最后一次有人听到他的消息。2017 年 8 月，他的家人通过非官方渠道得知他曾被一家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并被“判处死刑”，而且已在 2015 年遭杀害。¹²

慕尼尔·萨义德·塔里 (Munir Said Thalib) 是一名**印度尼西亚**人权捍卫者和律师，也是失踪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 (KontraS) 的共同创始人。2004 年 9 月，他在从雅加达飞往荷兰的航班上被毒死。尽管有 3 人因涉及慕尼尔的死亡事件而被定罪，但有可信指称显示负责策划谋杀的人一直逍遥法外。慕尼尔过去一直因为自己从事的人权工作而处于危险之中。¹³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警察侵犯人权的行为普遍泛滥，包括杀害和强迫失踪。多米尼加人权委员会 (Dominican Committee of Human Rights) 成员**胡安·阿尔蒙特·埃雷拉** (Juan Almonte Herrera) 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失踪，当时有 4 名男子强行将他押上一辆汽车后开走。目击者认出这些人是警察。不久之后，警方宣布他们正在寻找涉及一起绑架案的胡安·阿尔蒙特，并否认已将他关押。自从他失踪后，他的家人和律师称遭到警察跟踪和监视，并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多米尼加当局在调查他的下落方面所做甚少。¹⁴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下称“刚果(金)”)，人权组织“无声者之声” (Voix des Sans Voix) 的主任**弗洛里贝尔·舍贝亚** (Floribert Chebeya) 于 2010 年 6 月被发现死亡，一天前，他才被传唤到金沙萨警察总部进行会面。陪同他的同事**菲德尔·巴扎纳** (Fidèle Bazana) 也被绑架，据信已被杀害，但他的尸体从未被发现。弗洛里贝尔·切贝亚在去世前两周宣布，他将就下刚果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对刚果(金) 警队负责人提出投诉。¹⁵ 刚果(金) 高等军事法院在 2015 年宣布，4 名在初审时被判处死刑的警察无罪，第 5 名警察的刑期从终身监禁减为 15 年；另外 3 名嫌疑人逃离了该国。¹⁶

⁹ 国际特赦组织，《美国：致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的公开信》 (USA: Open Letter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ttorney General) (索引号：AMR 51/079/2009)。

¹⁰ 计划生育联合会，《对计划生育联合会的抹黑行动》 (Smear campaign against Planned Parenthood) , www.plannedparenthood.org/about-us/newsroom/campaigns/smear-campaign-against-planned-parenthood。

¹¹ 国际特赦组织，《几名活动人士与家人团聚；一人仍然失踪》 (Activists reunite with families; one still missing) (索引号：ASA 33/5603/2017)。

¹² 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巴塞爾·哈尔塔比爾被法外处决残忍地提醒人们叙利亚监狱的恐怖实况》 (Syria: Extrajudicial execution of Bassel Khartabil a grim reminder of Syrian prison horrors) (快讯，2017 年 8 月 2 日)。

¹³ 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新政府必须解决人权捍卫者慕尼尔遇害事件》 (Indonesia: New administration must resolve killing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 Munir) (索引号：ASA 21/024/2014)。

¹⁴ 国际特赦组织，《“如果你不想被杀就闭嘴！”多米尼加共和国警察的侵犯人权行为》 (“Shut up if you don't want to be kille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police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索引号：AMR 27/002/2011)。

¹⁵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要求调查刚果主要人权活动人士死亡事件》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mands investigation into death of leading human rights activist in Congo) (新闻报道，2010 年 6 月 2 日)。

¹⁶ 律师无国界 (Avocats sans Frontières) ，《切贝亚案的上诉判决：公民团体失望》 (Verdict d'appel dans l'affaire Chebeya: déception des parties civiles) ，2015 年 9 月 18 日，www.asf.be/fr/blog/2015/09/18/verdict-dappel-dans-laffaire-chebeya-deception-des-parties-civiles/。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高风险的职业和活动

人权捍卫者既以职业又以自愿者的身份开展工作。由于某些角色的性质以及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增加他们为人权发声的风险和后果，各国应采取具体步骤，了解与人权捍卫者从事的某些职业和活动相关的袭击模式如何反复出现，并确定必要采取的步骤来避免更多暴力事件发生。

2.1.1 新闻工作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在每个社会都极其重要，有助于公众监督和讨论，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关键。当记者、媒体工作者和博客作者遭到袭击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他们的工作，还有整个社会的知情权。那些专门揭露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包括那些报道武装冲突、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人，遭受袭击的事件居高不下。针对记者、博客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的暴力事件往往导致自我审查的出现，有可能成为当局压制人们对当权者表达异议和批评声音的有效工具。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是一个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报告称，2016 年全球有 48 名记者仅仅因为履行职责而遇害。近年来，记者遭杀害最多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墨西哥。¹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监察记者被杀害的问题，该组织报告称，2006 至 2015 年期间有 827 名记者遇害，其中阿拉伯国家有 287 人，亚太地区有 210 人，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有 176 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其成员国收到的信息显示，有记录的案件中只有 8% “破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涉及这些杀害事件的人逃过制裁已成常态。¹⁸

对记者来说，**伊拉克**是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在那里工作的人称，因为报道腐败和民兵侵害等敏感话题而遭人身袭击、绑架、恐吓、骚扰和死亡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2006 至 2015 年期间有 144 名记者在伊拉克遇难；被杀害的记者分布全国各地，包括库尔德斯坦地区。官方没有提供任何信息，交代调查或起诉状况。¹⁹ 2016 年 1 月，电视频道东方一台（al-Sharkia）的媒体工作者**赛义夫·塔拉尔**（Saif Talal）和**哈桑·阿尔安巴基**（Hassan al-Anbaki）在报道米格达迪耶（Muqadadiya）发生的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和一些民兵针对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报复袭击事件后，在返回途中被枪杀。迄今为止，当局没有适当调查这些杀人事件。²⁰ 记者**维达特·侯赛因·阿里**（Wedat Hussein Ali）于 2016 年 8 月在库尔德斯坦城市杜胡克（Dohuk）被绑架，后来他带有严刑拷打痕迹的尸体被人发现。他的亲属和同事说，他之前收到过死亡威胁，并遭到安全部队审问和殴打，还被要求充当线人，否则就要停止记者工作。²¹

叙利亚也是专业记者、公民记者和媒体活动人士因公殉职最多的国家之一，在 2006 至 2015 年期间至少有 78 人遇害，但几乎所有行凶者都能逃过制裁。²² 上述人士因记录和指出叙利亚政府和武装反对派团体在叙利亚武装冲突中实施的侵害行为，如非法杀戮、酷刑、强迫失踪、绑架和恐吓等，而成为打击目标。非政府组织**叙利亚媒体和言论自由中心**（Syrian Center for Media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成立于 2005 年，负责监察叙利亚的言论自由情况，并捍卫记者、博客作者和其他媒体活动人士的权利。近年来，该组织的办公室受到突袭，成员被拘捕和拷问，当中包括 2012 年 11 月在关押期间被殴打后死亡的**埃哈姆·哈祖尔**（Ayham Ghazzoul）。²³

¹⁷ 保护记者委员会，<https://cpj.org/killed/2016/>。

¹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通信发展方案，《是时候打破对记者的暴力循环行径：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危险的报告要点》（Time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Highlights from the UNESCO Secretary-General's 2016 report on the safety of journalists and the danger of impunity），https://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unesco_report_english_rgb.pdf。

¹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通信发展方案，《是时候打破对记者的暴力循环行径：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危险的报告要点》，http://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unesco_report_rgb_english.pdf。

²⁰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 2016/2017 年度报告：全球人权状况》（索引号：POL 10/4800/2017）。

²¹ 国际特赦组织，《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需要有效调查杀害记者事件》（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needed into killing of journalist）（索引号：MDE 14/4764/2016）。

²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通信发展方案，《是时候打破对记者的暴力循环行径：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危险的报告要点》，http://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unesco_report_rgb_english.pdf。

²³ 国际特赦组织，《释放因工作而在叙利亚被关押的媒体工作者》（Free media workers held for their work in Syria）（索引号：MDE 24/1587/2015）。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在**布隆迪**，自 2015 年 5 月的未遂政变以来，独立记者和人权捍卫者一直受到攻击。总统恩库伦齐扎（Nkurunziza）此前决定寻求第三个任期，但被许多人认为这有违布隆迪《宪法》和结束 10 年内战的《阿鲁沙协定》（Arusha Accords）。2016 年 7 月，独立报纸《伊瓦库报》（Iwacu）的记者**简·比吉里玛纳**（Jean Bigirimana）据信被布隆迪国家情报局人员绑架，此后一直失踪。在未遂政变发生后，安全部队在首都布琼布拉（Bujumbura）捣毁了 4 家主要的独立媒体公司，数十名记者之后逃离了布隆迪。²⁴

美洲人权委员会对所谓“沉默区”的存在表示关切，这些区域是**拉丁美洲**部分由有组织犯罪团伙控制的地区，当中有些有时是与当局串通或在当局默许之下出现。最受暴力影响的是报道有关腐败、贩毒、有组织犯罪、公共安全及人权等地方新闻的媒体工作者。涵盖这些领域的媒体工作者和博客作者经常被迫进行自我审查，以保全性命并继续工作。²⁵

“第 19 条”是一家捍卫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根据该组织的记录，2000 年至 2017 年 7 月在**墨西哥**有 107 名记者遇害，²⁶ 另外还有 23 人仍下落不明。²⁷ 他们报道的新闻涉及侵犯人权行为、安全部队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腐败和贩毒问题。2017 年发生的袭击，包括**哈维尔·瓦尔迪兹**（Javier Valdéz）在 5 月遇害²⁸ 和**米罗斯拉瓦·布里奇**（Miroslava Breach）在 3 月遇害的事件。²⁹ 二人都报道了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新闻。

在**孟加拉国**，表达被视为“伤害宗教情绪”的观点可能让人被口头攻击、监禁甚至谋杀。自 2013 年以来，至少有 7 名倡导非宗教人士权利的人权捍卫者仅因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杀害，包括 5 名博客作者、一名出版商和一名网上活动人士。别名**尼洛·伊尼尔**（Niloy Neel）的**尼拉德里·查托帕德伊**（Niladri Chattopadhyay）、**艾哈迈德·拉吉布·海德尔**（Ahmend Rajib Haider）、**阿维济特·罗伊博士**（Dr Avijit Roy）、**比乔伊·达斯**（Bijoy Das）、**瓦西可·拉赫曼**（Washiqur Rahman）、**费萨尔·阿贝丁·迪潘**（Faisal Abedin Deepan）和**纳齐穆丁·萨马德**（Nazimuddin Samad）被人以砍刀袭击而遇害。武装团体伊斯兰辅助者组织（Ansar al-Islam）声称对所有袭击负责，并称受害者在世俗问题上的著作驱使其发动袭击。当局没有就这些事件将任何人绳之以法，有时甚至将这些人的死归咎于受害者本身。³⁰

在**印度**，人权捍卫者兼记者**高丽·蓝克希**（Gauri Lankesh）于 2017 年 9 月在班加罗尔的住处外遭枪杀。她拥护言论自由，并直言不讳地批评强硬派印度教团体。之前，她曾因自己的活动而受到威胁。³¹

2.1.2 环境、领土和土地使用权

涉及土地、领土和环境的捍卫人权工作往往充满危险性，³² 而致力于处理这些问题的包括原住民、农村社区和无地社区。原住民要求使用其祖先土地，或就此类土地及其资源的使用被咨询，以便在自由和事先知情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的同意；此外，农村社区因为采矿或水电项目等自然资源的开采，而面临流离

²⁴ 国际特赦组织，《布隆迪记者仍然失踪》（Burundian journalist is still missing）（索引号：AFR 16/4832/2016）。

²⁵ 美洲人权委员会，《沉默区：行使言论自由的高危地区》（Zonas silenciadas: Regiones de alta peligrosidad para ejercer la libertad de expresión），2017 年 3 月 15 日，www.oas.org/es/cidh/expresion/docs/publicaciones/ZONAS_SILENCIADAS_ESP.pdf。

²⁶ “第 19 条”，《记者在墨西哥遇害》（Periodistas asesinados en México），2017 年 7 月 11 日，<https://articulo19.org/periodistasasesinados/>。

²⁷ “第 19 条”，《记者在墨西哥失踪》，2016 年，[www.article19.org/data/files/medialibrary/38261/Mexico---Informe-Especial-sobre-Periodistas-Desaparecidos-\[Feb-2016\].pdf](http://www.article19.org/data/files/medialibrary/38261/Mexico---Informe-Especial-sobre-Periodistas-Desaparecidos-[Feb-2016].pdf)。

²⁸ 国际特赦组织，《墨西哥：在言论自由被打压今年第 5 名记者遇害》（Mexico: Fifth journalist killed this year in sickening assault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新闻报道，2017 年 5 月 15 日）。

²⁹ 国际特赦组织，《职业诀窍？墨西哥的记者任意遭受袭击》（Tricks of the trade? Open season on journalists in Mexico）（新闻报道，2017 年 5 月 19 日）。

³⁰ 国际特赦组织，《陷于恐惧和镇压之间：孟加拉国对言论自由的攻击》（Caught between fear and repression: Attack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Bangladesh）（索引号：ASA 13/6114/2017）。

³¹ 国际特赦组织，《针对持异议者的袭击日增，著名记者遇害》（Prominent journalist killed amid growing attacks on dissent）（新闻报道，2017 年 9 月 6 日）。

³² 例如，国际特赦组织，《“我们以自己的血汗捍卫土地”：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土地、领土和环境捍卫者》（‘We are defending the land with our blood’: Defenders of the land, territory and environment in Honduras and Guatemala）（索引号：AMR 01/4562/2016）；全球见证，《地球保卫者》（Defenders of the earth），2017 年 7 月，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defenders-earth/；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他们对当权者讲真话却遭冷血谋杀》（They spoke truth to power and were murdered in cold blood），2016 年，www.protecting-defenders.org/sites/protecting-defenders.org/files/environmentaldefenders_0.pdf。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失所、贫困和污染问题；至于无地社区则在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并被农业综合企业侵占的地区挣扎生存。

全球见证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揭露自然资源需求与腐败、冲突和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该组织称，2016 年有 200 人在捍卫环境以及领土与土地使用权时遇害，还有无数人遭受威胁、不公起诉、暴力对待，而且社区出现分裂。对此类人权捍卫者而言，最致命的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印度和洪都拉斯**。³³ 在不少案例中，袭击升级与导致社区内部暴力的社会紧张局势有关，而社区内部出现暴力行为则是由于国家和私营公司在推动资源开发项目时，没有让相关人员充分参与，也没有进行真正磋商或通报有关信息。在其他案例中，暴力行为是国家安全部队或代表私营商业利益之私营保安人员的所为。

在**缅甸**，民众关注到该国位于实皆地区蒙育瓦（Monywa）的最大矿业项目为周边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生计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举行和平抗议活动，但却遭到警方以过度武力回应。³⁴ 2012 年 11 月，警方用含有白磷的手榴弹袭击抗议者，超过 100 人受伤，其中一些人遭严重烧伤和终身残疾。中国国有企业集团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子公司万宝矿产（缅甸）铜业有限公司向警方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2014 年 12 月，女性人权捍卫者**杜钦温**（Daw Khin Win）参与抗议反对在矿山附近发生的强制搬迁时被警察枪杀。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涉及杜钦温死亡或白磷攻击事件的官员受到起诉或制裁。³⁵

2016 年 3 月，土地和环境维权者兼阿玛迪巴危机委员会（Amadiba Crisis Committee）主席**西克霍希菲·“巴祖卡”·拉德比**（Sikhosiphi “Bazooka” Rhadebe）被两名自称是**南非**东开普省警察的男子枪杀。巴祖卡在去世前几个小时，得知自己是一份“暗杀名单”的头号目标，名单上还有**穆萨莫·德拉米尼**（Mzamo Dlamini）和**诺赫勒·姆布修马**（Nonhle Mbuthuma）等阿玛迪巴危机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几十年来，巴祖卡一直反对澳大利亚矿物商品有限公司（Mineral Commodities Ltd）在当地的一家子公司于邻近修罗贝尼（Xolobeni）的公共土地上露天开采钛和其他矿物。由于阿玛迪巴危机委员会反对开矿，其一些成员遭到威胁和袭击，施袭者包括支持采矿的社区成员。没有人因为西克霍希菲·“巴祖卡”·拉德比遇害而被绳之以法，此举增加了阿玛迪巴危机委员会其他领导人的风险。³⁶

那些保护公司项目且不受监管或无人监督的私营保安公司给反对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人权捍卫者和社区构成额外的风险。例如在 2009 年，反对菲尼克斯（Fénix）镍矿项目的社区领袖**阿道夫·伊奇·查曼**（Adolfo Ich Chamán）遭枪击并被砍死，以上项目位于**危地马拉**伊萨瓦尔省（Izabal）凯奇玛雅（Q'eqchi Maya）领土的埃尔埃斯托尔（El Estor）内。他的妻子为原住民人权捍卫者**安吉莉卡·乔克**（Angélica Choc），多年来遭到威胁和袭击，但仍坚持要讨回公道，争取起诉危地马拉镍矿公司的前保安负责人。上述公司是加拿大哈德贝矿产公司（Hudbay Minerals）的子公司，当时拥有该矿。³⁷ 经过 7 年多的时间后，法院最终于 2017 年 4 月得出判决，宣判被告无罪。在加拿大，一项针对哈德贝矿产公司的诉讼正在进行。³⁸

在**巴西**，那些保护环境打击非法采伐森林的人，以及那些为丧失和没有土地的社区争取土地使用权的人，挺身与那些开发自然资源、征用土地和反对土地改革的强大利益抗争。该国多年来一直存在杀害维权者的态势，而且自从全国保护人权捍卫者计划（National Program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在 2016 年被削弱以来，情况似乎有所恶化。目前该计划没有运作，令数以百计的维权者面临风险。³⁹ 巴西人权捍卫者委员会（Comitê Brasileiro de Defensoras e Defensores de Direitos Humanos）

³³ 全球见证，《地球保卫者》，2017 年 7 月，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defenders-earth/。

³⁴ 蒙育瓦项目包括莱比塘（Letpadaung）铜矿、萨比塘（Sabetaung）与七星塘（Kyisintaung）铜矿，以及莫枝奥（Moe Gyo）硫酸厂。

³⁵ 国际特赦组织，《多灾多难：缅甸莱比塘铜矿的人权侵犯持续》（Mountain of trouble: Human rights abuses continue at Myanmar's Letpadaung mine）（索引号：ASA 16/5564/2017）。

³⁶ 国际特赦组织，《南非：人权捍卫者受到威胁》（South Africa: Human rights defenders under threat）（索引号：AFR 53/4058/2016）。

³⁷ 国际特赦组织，《危地马拉：涉及社区领袖阿道夫·伊奇·查曼死亡的审判结束，这是正义的关键时刻》（La conclusión del juicio por la muerte del líder comunitario Adolfo Ich Chamán, un momento crucial para la justicia）（索引号：AMR 34/5252/2016）。

³⁸ Marketwired，《Klippensteins 大律师和律师：加拿大矿业公司案被指控的凶手在危地马拉被判无罪》（Klippensteins Barristers & Solicitors: Alleged killer in Canadian mining company lawsuit acquitted in Guatemala），2017 年 4 月 7 日，<https://finance.yahoo.com/news/klippensteins-barristers-solicitors-alleged-killer-005323123.html>。

³⁹ 国际特赦组织，《巴西：警察杀人、有罪不罚和针对维权者的袭击——国际特赦组织就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意见书，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 27 届会议，2017 年 5 月》（Brazil: Police killings, impunity and attacks on defenders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称，2016 年有 66 名维权者遇害，而 2017 年 1 月至 8 月则有 58 名维权者遇害，其中大多数是原住民、农村无地工作者和其他致力于处理与土地、领土和环境有关问题的人。⁴⁰ 2017 年 5 月，10 名于帕拉州（Pará state）保达尔库（Pau D'Arco）一个大农场边缘露营的农村工作者和土地权利活动人士在警方采取行动驱赶他们时被枪杀。两个月后，即 7 月，该群农村工作者的其中一名领袖**罗森尔多·佩雷拉·德阿尔梅达**（Rosenildo Pereira de Almeida）也被枪杀。这场屠杀的幸存者仍然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⁴¹

在**洪都拉斯**，仅在 2016 年就有 14 名环保人权捍卫者遇害。⁴² 2016 年 3 月，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被谋杀，她所领导的**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Consejo Cívico de Organizaciones Populares e Indígenas de Honduras）的人权捍卫者多次受到袭击，因此她的遇害只是众多针对他们的袭击之一。此外，其姊妹组织**拉巴斯独立伦卡原住民运动**（Movimiento Independiente Indígena Lenca de La Paz）的成员和争取土地使用权的农村农民社区成员也遭到袭击。**巴霍雅冈**（Bajo Aguán）是一个军事化地区，被非洲棕榈种植园所包围，绵延数英里。2008 至 2013 年间，当地发生暴力事件，造成 129 人被杀，6 人遭强迫失踪。⁴³ 2016 年 10 月，雅冈联合运动的**何塞·安赫尔·弗洛雷斯**（José Ángel Flores）和**锡尔莫·迪奥尼西奥·乔治**（Silmer Dionisio George）遇害。何塞·安赫尔·弗洛雷斯曾称因他的人权工作而遭到威胁。⁴⁴ 美洲人权委员会已准予对多名处于危险中的维权者采取预防措施，但当局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确保他们得到有效保护，或将行凶者绳之以法。

对于捍卫获得健康环境的权利的人来说，**菲律宾**也是最致命的地方之一，2016 年记录到 28 起活动人士遇害的事件，其中大多数与反对采矿和其他采掘业的抗争有关。⁴⁵ 人权捍卫者**特雷西塔·纳瓦西拉**（Teresita Navacilla）关注南棉兰老岛的金金（King-king）矿业项目这个菲律宾第二大金矿和铜矿所带来的影响，她因为自己的活动而成为袭击目标，在 2016 年 1 月死于枪伤。⁴⁶ 2016 年 7 月，著名的环保人士**格洛丽亚·卡皮坦**（Gloria Capitán）在她的家乡马里韦莱斯（Mariveles）被枪杀。她由于担心当地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生计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所以反对使用煤炭储存设施和扩建燃煤电厂。至目前为止，没有人因她的死被追究责任。⁴⁷

2.1.3 劳工权利

在劳工权利领域工作的人权捍卫者也经常成为袭击对象。工会会员是活动人士中最显著的一群，在世界各地竭力为工人争取适当条件和工资以及其他人权，结果却遭受威胁、不公起诉、任意拘押和杀害。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称，有 11 个国家的工会会员在 2016 年因自己

submission for the UN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 27th session of the UPR Working Group, May 2017) (索引号: AMR 19/5467/2016)。

⁴⁰ 巴西人权捍卫者委员会，《挣扎生活：巴西人权捍卫者被定罪和遭受暴力》（Vidas em Luta. Criminalização e violência contra defensoras e defensores de direitos humanos no Brasil），2017 年 7 月，http://comiteddh.org.br/wp-content/uploads/2017/07/terra-de-direitos_dosie_040717_web.pdf；《委员会谴责针对巴西维权者的暴力行为急剧增加》（Comitê denuncia aumento vertiginoso da violência contra defensoras e defensores no Brasil），2017 年 9 月 11 日，<http://comiteddh.org.br/ultimas-noticias/comite-denuncia-aumento-vertiginoso-da-violencia-contra-defensoras-e-defensores-de-direitos-humanos-no-brasil/>。

⁴¹ 前线卫士，《土地权利捍卫者罗森尔多·佩雷拉·德阿尔梅达遇害》（Land rights defender Rosenildo Pereira de Almeida killed），2017 年 7 月 11 日，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judge-releases-13-policemen-allegedly-involved-pau-darco-massacre#case-update-id-6394。

⁴² 全球见证，《地球捍卫者》，2017 年 7 月，www.globalwitness.org/en-gb/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defenders-earth/；国际特赦组织，《洪都拉斯：为贝尔塔·卡塞雷斯谋杀案伸张正义的进程受威胁》（Honduras: Justice still in jeopardy in Berta Cáceres murder case）（索引号: AMR 37/6335/2017）。

⁴³ 雅冈人权观察站（Observatorio de Derechos Humanos del Aguán），《2008-2013 年巴霍雅冈土地冲突相关的暴力死亡统计报告》（Informe estadístico de muertes violentas relacionadas al conflicto de tierras en el Bajo Aguán 2008-2013），2014 年 2 月，www.diakonia.se/globalassets/documents/diakonia/where-we-work/latinoamerica/honduras--informe-estadistico-de-muertes-violentas-relacionadas-al-conflicto-de-tierras-en-el-bajo-aguan-2008-2013.pdf。

⁴⁴ 国际特赦组织，《活动人士被杀事件使洪都拉斯成为环保活动人士的禁区》（Activists' murders turn Honduras into no-go zone for environmental campaigners）（新闻稿，2016 年 10 月 19 日）。

⁴⁵ 全球见证，《地球捍卫者》，2017 年 7 月，www.globalwitness.org/en-gb/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defenders-earth/。

⁴⁶ 前线卫士，《特雷西塔·纳瓦西拉被法外处决》（Extrajudicial killing of Teresita Navacilla），2016 年 2 月 9 日，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case-history-teresita-navacilla。

⁴⁷ 国际特赦组织，《2016/2017 年度报告》（索引号: POL 10/4800/2017）。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的活动遇害，包括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意大利、毛里塔尼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和委内瑞拉。⁴⁸

在**哥伦比亚**国内冲突期间，由于当地的工会会员经常成为准军事部队袭击的目标，因此是全球处境最危险的群体之一。⁴⁹ 据全国工会学院（Escuela Nacional Sindical）的纪录，从1986至2011年共有2,863名工会成员遇害。⁵⁰ 尽管暴力事件发生的频率有所放缓，但根据记录近年仍有人被杀害：2010至2015年期间，186名工会成员遇害，22人遭强迫失踪，其中大多数为工会领袖。⁵¹ 2013年11月，全国食品工业工人工会（Sindicato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Industria de Alimentos）的领袖**奥斯卡·洛佩斯·特里维诺**（Óscar López Triviño）遭到枪杀，该工会代表位于考卡山谷省（Valle del Cauca Department）布加拉格兰德（Bugalagrande）的雀巢工厂工人。他的同事**何塞·奥诺弗雷·埃斯基韦尔·鲁纳**（José Onofre Esquivel Luna）虽然受到国家保护，但仍于2014年6月遭到两名乘摩托车的男子枪击，他受袭后死里逃生。⁵²

危地马拉是美洲最贫穷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该国工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侵犯，包括结社自由权和组织工会权的保护方面，⁵³ 在此背景下，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非常低。危地马拉劳工权利捍卫者网络（Red de Defensores de Derechos Laborales de Guatemala）称，2007至2016年期间，超过84名劳工权利捍卫者遇害，并有多人遭到抹黑、恐吓、威胁、任意拘押和人身袭击。⁵⁴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Carlos Hernández）是全国卫生工作者工会的会员，也是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2013年，他在危地马拉东部城市奇基穆拉（Chiquimula）被枪杀。他曾在一次会议中公开反对当地的森林开伐活动，之后便收到死亡威胁。⁵⁵

2.1.4 人权律师和其他司法领域工作者

人权律师的工作极其重要，可确保受害者有机会诉诸法律和获得补偿，但亦往往因此而成为袭击目标。其他捍卫人权的司法领域工作者如法官和检察官，也经常受到不同类型的压力，目的是损害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当中可包括直接恐吓，力图阻止他们为受害者提供正义和补偿。

在**菲律宾**，2001至2014年间至少有41名律师和18名法官遇害，其中9名律师当时正在处理与人权有关的案件。⁵⁶ 2015年，3个月内又有3名法官被杀，包括**维尔弗雷多·尼威斯**（Wilfredo Nieves），据他的遇害与他的一名犯罪团伙头目的判刑有关。⁵⁷

⁴⁸ 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会联合会2017年全球权利指数》（The 2017 ITUC Global Rights Index），www.ituc-csi.org/IMG/pdf/survey_ra_2017_eng-1.pdf。

⁴⁹ 国际特赦组织，《杀害、任意拘押和死亡威胁：哥伦比亚工会运动的现实情况》（Killings, arbitrary detentions, and death threats: The reality of trade unionism in Colombia）（索引号：AMR 23/001/2007）。

⁵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识过去，建设未来—关于针对工会会员和工会工人的暴力行为的报告，1984-2011年》（Acknowledging the past, building the future. Report on violence against trade unionists and unionized workers, 1984-2011），2013年，www.co.undp.org/content/colombia/es/home/library/democratic_governance/-informe-sobre-violencia-contra-sindicalistas-y-trabajadores-sin.html。

⁵¹ 全国工会学院，《不会保持沉默的声音：关于侵犯工会会员人权和有罪不罚情况的报告，2010-2015年》（Voces que no callan: Informe sobre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de los y las sindicalistas, y la situación de impunidad, 2010-2015），2016年11月，www.ens.org.co/lee-y-aprende/lee-y-descarga-nuestras-publicaciones/derechos-humanos-violencia-antisindical/cuaderno-derechos-humanos-24-voces-no-callan-informe-violaciones-los-derechos/。

⁵² 国际特赦组织，《捍卫美洲的人权：必要、合法而且危险》（Defending human rights in the Americas: Necessary, legitimate and dangerous）（索引号：AMR 01/0003/2014）。

⁵³ 人权高专办，《危地马拉新的最低工资是“可持续发展的倒退”——联合国人权专家》，2015年2月17日，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5575&LangID=E。

⁵⁴ 危地马拉劳工权利捍卫者网络，《危地马拉2015至2016年有关反工会暴力行为的报告》（Informe sobre violencia antisindical - Guatemala 2015-2016），2017年，www.solidarity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Guatemala.Anti-Union-Violence-Network-2015-to-2016-report.Spanish.6.17DM-1.pdf。

⁵⁵ 国际特赦组织，《危地马拉的人权捍卫者面临危险》（Guatemala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t risk）（索引号：AMR 34/002/2013）。

⁵⁶ 菲律宾：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Day of the endangered lawyer），2015年1月23日，<http://dayoftheendangeredlawyer.eu/activities/#2015>。

⁵⁷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2015/2016年度报告》（索引号：POL 10/2552/2016）。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洪都拉斯国家人权专员（Comisionado 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de Honduras）报告说，2010 至 2016 年期间，该国至少有 117 名法律专业人员遇害，包括律师、检察官和法官。2013 年，法官**米雷娅·艾菲海尼亚·门多萨·佩纳**（Mireya Efigenia Mendoza Peña）在约罗省（Yoro Department）的埃尔普罗格雷索（El Progreso）被乘摩托车的武装男子杀害。她是民主法官协会（Asociación de Jueces por la Democracia）的成员，该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加强洪都拉斯的司法制度。⁵⁸

在**乌克兰**，被视为挑战当局的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受到骚扰，并在某些情况下献出了生命。2016 年 3 月，刑事辩护律师**尤里·格拉博夫斯基**（Yuri Grabovsky）被绑架，他带有枪伤的尸体后来被发现。他之前曾诉说遭到当局骚扰，这和他为一名因恐怖主义指控受审的俄罗斯公民辩护的工作有关。**他的同事奥克萨娜·索科洛夫斯卡亚**（Oksana Sokolovskaya）为另一名受到相同指控的俄罗斯男子辩护，也诉说因工作遭到骚扰和威胁。⁵⁹

在**肯尼亚**，律师**威利·基马尼**（Willie Kimani）、他的委托人**约斯法特·姆温德瓦**（Josephat Mwendwa）和出租车司机**约瑟夫·穆易鲁利**（Joseph Muiruri）在 2016 年 6 月被警察强迫失踪；他们的尸体多日后被发现。约斯法特·姆温德瓦举报一名警察向他任意开枪后面临莫须有的指控，3 人在出席姆温德瓦的庭审后遭到绑架。威利·基马尼是法律援助慈善机构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的律师，经常处理有关法外处决的案件。⁶⁰ 人权组织记录到 2009 年起有 300 多人在安全和执法机构手中强迫失踪的案件，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发现死亡。⁶¹

2004 年，**泰国**穆斯林律师协会主席兼泰国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颂猜·尼拉派吉特**（Somchai Neelapaijit）在泰国曼谷被绑架和强迫失踪。在他被绑架之前，曾对警察据称向被拘留者实施酷刑的事表示关切。5 名警察因这起绑架案受审，当中 4 人被判无罪，余下一人以相对轻微的胁迫罪名被定罪，但其定罪判决在上诉时被推翻。⁶²

马诺埃尔·马托斯（Manoel Mattos）是**巴西**伯南布科州（Pernambuco）的一名律师，也是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的成员。2009 年 1 月，他被两名戴头罩的男子近距离枪杀。由于马诺埃尔·马托斯的工作揭露了巴西东北部各地暗杀小组的杀人和侵害行为，因此他多次收到死亡威胁。尽管他面对这些威胁，而且美洲人权委员会曾要求采取预防措施保护他，但当局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⁶³ 2015 年，5 名被控谋杀他的男子受审，当中两人被判有罪，包括一名军警。

2.2 因身份而遭袭击

经历交叉形式歧视和结构性不平等的人权捍卫者因为他们的工作及身份而面临袭击的风险增加。歧视和压迫可能是基于年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语言、族裔、性取向、性别认同、种族、种姓或阶级、原住民身份、残疾状况、宗教或信仰、国籍或其他身份。这些不同形式的歧视可能重叠和相互影响，加深一个人的体验并令它发生变化。遭受歧视的人权捍卫者往往被剥夺资源、机会和安全感，并常常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

⁵⁸ 国际特赦组织，《洪都拉斯：国际特赦组织谴责近期杀害正义、平等和人权捍卫者的事件》（Honduras: Amnesty International condemns the recent killings of individuals defending justice,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索引号：AMR 37/007/2013）。

⁵⁹ 国际特赦组织，《乌克兰：律师被杀事件冲击司法公正》（Ukraine: Murder of lawyer a chilling blow to justice）（新闻稿，2016 年 3 月 25 日）。

⁶⁰ 国际特赦组织，《肯尼亚：律师被警察失踪和处决案出现转折性裁决》（Kenya: Watershed ruling on lawyer's disappearance and execution by police）（新闻稿，2016 年 8 月 11 日）。

⁶¹ 国际特赦组织，《肯尼亚：针对数百起强迫失踪和杀人事件展开司法调查》（Kenya: Set up judicial inquiry into hundred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killings）（新闻稿，2016 年 8 月 30 日）。

⁶² 国际特赦组织，《泰国：司法界悲哀的一天，涉嫌重要人权捍卫者被强迫失踪案的警察被判无罪，家属被剥夺了共同原告权利》（Thailand: Sad day for justice as police officers acquitted and family denied right of co-plaintiff in the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leading human rights defender）（索引号：ASA 39/3132/2015）。

⁶³ 国际特赦组织，《人权活动人士在巴西遭暗杀》（Human rights activist assassinated in Brazil）（新闻报道，2009 年 1 月 27 日）。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2.2.1 女性人权捍卫者

女性人权捍卫者可以是从事任何人权问题工作的妇女，也可以是任何从事妇女权利或与性别有关问题的维权者。由于性别的关系，她们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特别是当她们公开争取人权并挑战社会规范时。除了其他维权者可能受到的袭击之外，女性人权捍卫者还面临特定形式的性别暴力，其中包括性暴力、涉及其女性身份的刻板印象丑化及抹黑诽谤。许多女性人权捍卫者在家里及社区中承受更大的压力，尤其当她们的行动或公共活动被视为不接受或挑战他人期待她们遵守的性别规范或性别定型观念时。女性人权捍卫者普遍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在性、性别角色及妇女在社区和家庭中的地位方面有严格观念的父权社会里。2017年6月，在危地马拉，基切人民委员会（Consejo de Pueblos K'iche）的原住民女性人权捍卫者**奥拉·洛丽塔·查韦斯**（Aura Lolita Chávez）遭到武装男子威胁要性侵和杀死她。⁶⁴她对妇女发展协会（Associ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ment）说：“当他们威胁我时，他们说会杀了我，但在杀我之前，他们会先强奸我。他们没有对我的男同事说同样的话，这些威胁是专门对原住民妇女说的。他们也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把我们说成无所事事的印第安反叛女性，而且不把我们当人看。”⁶⁵

从私人到公共领域，由于针对女性人权捍卫者的暴力行为在不同背景下出现，不论这些行为是否与妇女的人权活动或其身份直接相关，各国都有额外的义务来采取步骤防止暴力发生，当中包括尽责行事以制止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⁶⁶并与女性活动人士协商，以建立有效和具有性别敏感性的保护机制。

希娜·沙纳瓦兹（Hina Shahnawaz）在**巴基斯坦**的国际助老会（HelpAge International）工作，这是一个提倡老年人权利的组织。她是一名职业女性，财政独立而且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也由于此，她挑战自己所在国家针对女性的社会规范和性别角色。她于2017年2月被枪杀；一名亲戚因涉嫌杀害她而被捕。⁶⁷2016年期间，**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记录了512名妇女和女童以及156名男子和男童以“维护荣誉”为由被杀害。巴基斯坦最终于2016年修订法律，将“荣誉杀人”定为罪行，违法者会被处以强制性监禁刑，可是，如果行凶者获得家属的宽恕，判刑仍然可获减轻。⁶⁸

在**尼泊尔**，女性人权捍卫者因敢于挑战父权制而面临极高风险，许多人因提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问题，而遭社会边缘化，并成为恐吓、殴打和杀害目标。尼泊尔警方往往没有彻底调查这些袭击及提供保护。2009年1月，今日FM电台的记者兼女性人权捍卫者网络的成员**乌玛·辛格**（Uma Singh）遭人持刀袭击并伤重死亡。⁶⁹6个月前，即2008年6月，女性人权捍卫者网络的另一名成员**莱克斯米·波哈拉**（Laxmi Bohara）遭丈夫和婆婆毒打并被迫服毒后死亡。二人批评她的人权工作与妻子和母亲应当履行的传统角色并不相符。⁷⁰

阿富汗国家警察在调查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的投诉以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包括有害的传统习俗时，正好处于捍卫和保护妇女人权的第一线。女警尤其成为针对目标，因为她们在保安部队的存在挑战了大众对于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根深蒂固观念，而女警也经常遭受来自警察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歧视和恐吓。赫尔曼德省（Helmand province）两名高级女警官**伊斯兰·比比**（Islam Bibi）和**内加·比比**

⁶⁴ 国际特赦组织，《原住民维权者遭到袭击并面临危险》（Indigenous defenders attacked and at risk）（索引号：AMR 34/6466/2017）。

⁶⁵ 妇女发展协会，《女性人权捍卫者对抗采掘业》（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onfronting Extractive Industries），2017年，www.awid.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whrds-confronting_extractive_industries_report-eng.pdf。

⁶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35号一般性建议，更新第19号一般性建议》，2017年7月14日，联合国文件编号：CEDAW/C/GC/35。

⁶⁷ 希娜·沙纳瓦兹，<https://hrdmemorial.org/hrdrecord/hina-shahnawaz/>。

⁶⁸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2016/2017年度报告》（索引号：POL 10/4800/2017）。

⁶⁹ 国际特赦组织，《尼泊尔：政府没有保护女性人权活动人士免遭暴力袭击》（Nepal: Government fails to protect women human rights activists from violent attacks），www.amnesty.org/en/press-releases/2009/04/nepal-government-fails-protect-women-human-rights-activists-violent-atta/。

⁷⁰ 女性人权捍卫者国际联盟（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ternational Coalition），《全球女性人权捍卫者处境报告》（Global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2012年，http://defendingwomen-defending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4/03/WHRD_IC_Global-Report_2012.pdf。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Negar Bibi) 分别于 2013 年 7 月和 9 月被枪杀，两人之前收到无数次死亡威胁，要求她们辞掉工作，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她们。⁷¹

在**墨西哥**，女性人权捍卫者争取为强迫失踪和凶杀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时，成为致命袭击的目标。墨西哥有 3 万多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在毒品战争期间被有组织犯罪团伙强迫失踪或绑架。⁷² **米里亚姆·伊丽莎白·罗德里格斯** (Miriam Elizabeth Rodríguez) 在 2012 年女儿失踪后开始捍卫人权。她对当局的不作为感到沮丧，因此自己进行调查，结果令她找到女儿的遗体及有关谋害她女儿的凶手的信息。米里亚姆·伊丽莎白·罗德里格斯本人在 2017 年 5 月遇害。她之前曾多次遭到威胁，但当局没有提供适当保护。

73

2.2.2 同志权利捍卫者

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权利的捍卫者遭到袭击，这既因为他们的身份，也因为他们的行动：他们可能因为自己真实或被认定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成为袭击目标，也可能因为捍卫与性别和性有关的权利而成为目标。⁷⁴ 同志权利捍卫者面临巨大风险，因为他们的工作挑战社会结构、传统习俗和对宗教戒律的解释，而这些戒律可能长期以来被用来纵容侵犯人权行为并为这些行为开脱。⁷⁵

2016 年 4 月，著名的同志问题活动人士**修哈兹·曼南** (Xulhaz Mannan) 及他的同事**曼赫布卜·拉比·托诺伊** (Mahbub Rabbi Tonoy) 在孟加拉国的达卡被砍死。修哈兹·曼南是《卢普班》(Roopban) 的编辑，这是孟加拉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本关于同志问题的杂志。在二人被杀前的几个月里，他和该杂志的其他工作人员收到大量威胁。在袭击发生几天前，由于安全问题，支持同志权利的达卡年度“彩虹游行”被取消。武装团体伊斯兰辅助者组织后来声称杀害了修哈兹·曼南和曼赫布卜·拉比·托诺伊。至少有两名男子因谋杀而被捕，但尚未受到任何指控。⁷⁶

在**南非**，性侵同志和针对他们的其他人身袭击仍普遍发生，特别在乡镇和农村地区。2011 年 4 月，女同性恋人权捍卫者**诺克洛·诺沃萨** (Noxolo Nogwaza) 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乡镇被强奸、殴打和刺伤后身亡，这次事件似乎与她的性取向有关。针对该谋杀案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袭击者仍然在逃，这加剧了有罪不罚的现象。在她去世前的 5 年间，至少有 10 名女同性恋者在该国各地遭到强奸和谋杀。⁷⁷

在**乌干达**，同性之间发生性行为可被判处监禁。自 2009 年起，当局一直试图通过立法施加更严厉的惩罚。公众围绕这个问题有激烈的辩论，结果，更多的同志被告发，人们遭袭击的次数增多，在公开场合出现更多侮辱性的语言，包括媒体在同性恋议题上哗众取宠的报道。2010 年末，著名同志权利活动人士**大卫·卡托** (David Kato) 的照片出现在一份周报上，标题为“绞死他们”，上面还有他和其他一些人的个人信息。2011 年初，他针对该小报取得了禁制令，但不久之后却在家中被害。⁷⁸

在**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市 (San Pedro Sula) 萨姆佩德拉纳 (Sampedrana) 同性恋社区主席**勒内·马丁内斯** (René Martínez) 在 2016 年 6 月 3 日被发现死亡，尸体上有遭受酷刑的痕迹。他几天前遭到绑

⁷¹ 国际特赦组织，《她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阿富汗的女性人权捍卫者遭到袭击》(Their lives on the line: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under attack in Afghanistan) (索引号：ASA 11/1279/2015)。

⁷² 国际特赦组织，《“怠惰以对”：墨西哥对国内失踪者问题的回应》(‘Treated with indolence’: The state’s response to disappearances in Mexico) (索引号：AMR 41/3150/2016)。

⁷³ 国际特赦组织，《墨西哥：活动人士在塔毛利帕斯州遇害事件突显政府的疏忽》(Mexico: Killing of activist in Tamaslipas highlights government negligence) (新闻报道，2017 年 5 月 11 日)。

⁷⁴ 女性人权捍卫者国际联盟，《性别记录：女性人权捍卫者情况介绍和使用手册》(Gendering documentation: A manual for and about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2015 年，www.defendingwomen-defending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GENDERING-DOCUMENTATION-FINAL-3-min.pdf。

⁷⁵ 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01 年 7 月 3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56/156。

⁷⁶ 国际特赦组织，《陷于恐惧和镇压之间：孟加拉国对言论自由的攻击》(索引号：ASA 13/6114/2017)。

⁷⁷ 国际特赦组织，《当爱成为罪：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同性性行为定为非法》(Making love a crime: Criminalization of same-sex conduct in sub-Saharan Africa) (索引号：AFR 01/001/2013)。

⁷⁸ 国际特赦组织，《当爱成为罪：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同性性行为定为非法》(索引号：AFR 01/001/2013)。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架。同样在洪都拉斯，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同志权利组织彩虹协会**（Asociación Arcoiris）的成员是36起安全事件的受害者，当中包括被杀害、威胁、监视和骚扰。⁷⁹

在某些国家，**跨性别维权者**受到袭击的风险尤其高。欧洲跨性别组织（Transgender Europe）的监测跨性别者被谋杀项目发现，2008至2016年期间，全球69个国家有2,343起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性人士被杀害的事件。该组织指出，真实数字可能要高得多。⁸⁰

巴西是全球记录在案的跨性别者遇害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⁸¹这也使得那些争取人权的跨性别活动人士面临更大风险。巴西人权捍卫者委员会称，2017年2月，跨性别活动人士兼性工作者**米雷拉·德卡洛**（Mirella de Carlo）被发现在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的寓所内遭谋杀。⁸²

在**阿根廷**，著名同志活动人士和跨性别女性**阿曼凯·戴安娜·萨卡扬**（Amancay Diana Sacayán）于2015年10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寓所内被发现死亡，她的尸体有遭遇暴力的痕迹。一个月前，跨性别女性兼同志组织领导人**玛塞拉·乔科巴**（Marcela Chocobar）和**科蒂·奥尔莫斯**（Coty Olmos）分别在圣菲省（Santa Fe）和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遇害。⁸³

在**洪都拉斯**，许多“娃娃团体”（Grupo Muñecas，隶属于同志团体彩虹协会）的跨性别维权者和其他跨性别活动人士几年来遭受袭击死亡。**谢琳·蒙托亚**（Sherlyn Montoya）是最新的受害者之一；她的尸体在2017年4月被发现，身上有遭受酷刑的痕迹。⁸⁴

2016年5月，巴基斯坦跨性别者行动组织（Trans Action Pakistan）的年轻活动人士**阿莱莎**（Alesha）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遭到枪击，几天后伤重死亡。跨性别者行动组织的成员之前曾因为人权工作而遭到迫害和骚扰。⁸⁵

2.2.3 人权捍卫者和性工作

身为性工作者或捍卫性工作者权利的人权捍卫者面临多重歧视和暴力，她们因为身份（例如女性、跨性别人士）、作为性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她们的行动而遭到袭击。她们捍卫人权的工作没有得到充分承认，或遭到削弱，并有可能遭受顾客、警察、房东、周围社区以及犯罪团伙等剥削她们的第三方的暴力和歧视。在大多数国家，从事性工作极大的耻辱，而且被定为非法，以致性工作者遭受羞辱和边缘化，这往往意味着她们必须在孤立的环境中暗地里工作。如果她们向警方举报自己遭受暴力行为，就有被定罪的风险。结果，性工作者未就遭受暴力和侵害的大部分事件报案，这些事件没有得到适当调查，而肇事者也没有受到惩罚。⁸⁶由于性工作者需要保护自己免遭暴力和边缘化，所以不时参与捍卫人权。欧洲跨性别组织称，2016年遇害的跨性别者中有64%是性工作者：与性工作相关的边缘化和歧视、跨性别身份以及在争取权利时引起的注意，都增加了遇袭风险。⁸⁷例如，2009至2012年在**洪都拉斯**遇害的

⁷⁹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2016/2017年度报告》（索引号：POL 10/4800/2017）。

⁸⁰ 欧洲跨性别组织，《2017年跨性别现身日》（Trans Day of Visibility 2017），新闻稿，<http://transrespect.org/en/tdov-2017-tmm-update/>。

⁸¹ 卡斯滕·巴尔泽尔（Carsten Balzer）/卡拉·拉加塔（Carla LaGata）和卢卡斯·贝雷多（Lukas Berredo）/欧洲跨性别组织，《2016年监测跨性别者谋杀事件年度报告》（Trans murder monitoring annual report 2016），<http://transresp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TvI-PS-Vol14-2016.pdf>；美洲人权委员会，《针对同志的暴力行为》（Violence against LGBTI people），2015年，OAS/Ser.L/V/II/rev.2，www.oas.org/es/cidh/informes/pdfs/ViolenciaPersonasLGBTI.pdf。

⁸² 巴西人权捍卫者委员会，《挣扎生活：巴西人权捍卫者被定罪和遭受暴力》，2017年7月，http://comiteddh.org.br/wp-content/uploads/2017/07/terra-de-direitos_dosie_040717_web.pdf。

⁸³ 国际特赦组织，《阿根廷必须调查针对跨性别活动人士的可怕袭击浪潮》（Argentina must investigate horrific wave of attacks against trans activists）（新闻报道，2015年10月14日）。

⁸⁴ 前线卫士，《同志维权者谢琳·蒙托亚遭谋杀》（Asesinato de defensora de derechos LGBTI Sherlyn Montoya），2017年4月7日，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s/case/case-history-sherlyn-montoya。

⁸⁵ 前线卫士，《跨性别人权捍卫者阿莱莎遭枪杀》（Transgender human rights defender Alesha shot dead），2016年5月26日，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case-history-alesha。

⁸⁶ 国际特赦组织，《性工作者面临危险：针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犯行为研究报告摘要》（Sex workers at risk: A research summary on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sex workers）（索引号：POL 40/4061/2016）。

⁸⁷ 欧洲跨性别组织，《2017年跨性别现身日》，新闻稿，<http://transrespect.org/en/tdov-2017-tmm-update/>。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27 名跨性别女性中，有 15 人积极参与跨性别者权利组织“粉色集体”（Colectivo Unidad Color Rosa）的活动，该组织大多数成员都是性工作者和活动人士。⁸⁸

安吉莉卡·金塔尼拉（Angélica Quintanilla）是**萨尔瓦多**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利基丹巴（Liquidambar）的负责人。她组织活动，以提倡性工作者的权利，争取她们的工作获得认可和尊严，并向她们提供有关其权利的信息。2016 年 5 月，她在圣萨尔瓦多的工作地点被枪杀。⁸⁹ 圣萨尔瓦多的性工作者经常遭到警察及苛索金钱和控制势力范围的帮派成员骚扰和暴力对待。

2004 年 1 月，来自阿根廷罗萨里奥（Rosario）的性工作者兼阿根廷女性性工作者协会（Asociación de Mujeres Meretrices de la Argentina）秘书长**桑德拉·卡布雷拉**（Sandra Cabrera）遇害。她致力于维护性工作者的人权，这些性工作者反复遭到当地警方的骚扰和勒索。桑德拉·卡布雷拉曾向当局报告，表示她和她的小女儿不断遭到人身暴力威胁。在去世前一个月，她在家中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但当时最终获派保护她的警察却在家外。⁹⁰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骄傲游行自 2015 年起一直受到压制。在那一年，数以千计参加游行的人遭到警察以水炮、催泪弹和胡椒球投掷物袭击。⁹¹ 年轻的跨性别活动人士**汉德·加达**（Hande Kader）是遇袭者之一。一年多后的 2016 年 8 月 12 日，她的尸体在她失踪多日后被发现，她曾经遭到强奸、肢解和被火烧。她是一名性工作者，最后被人见到时正与一名似乎是顾客的人上车。⁹² 与其他地方一样，与性工作和跨性别身份有关的歧视和边缘化，使土耳其捍卫跨性别工作者权利的活动人士成为暴力袭击目标。

2.2.4 原住民和非洲裔维权者

世界上有不少地方的**原住民和非洲裔社区**长期经受匮乏、排斥、贫困之苦，并被夺去土地和流离失所。他们往往要争取在祖先土地上生活的权利，而他们在自由和事先知情的情况下被征求同意的权利往往被忽视。当他们与那些侵占其领土和侵犯其权利的企业等强大利益抗争时，就会遭受压力和袭击。这些社区的成员在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成为人权捍卫者时面临巨大风险。全球见证组织称，2016 年遇害的土地、领土和环境问题人权捍卫者中有 40%是原住民。⁹³

以暴力和恐吓的手段强迫人们流离失所和强占人们的土地，是**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的其中一个主要特点，而原住民、非洲裔和农民社区却首当其冲。这些社区的身份和生计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土地密切相关，流离失所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非常严重。活动人士和社区要求当局尊重和保护他们的权利，包括土地划界和归还土地的权利，但他们的抗争却总是充斥着暴力。2017 年 4 月，考卡（Cauca）地区的原住民领袖**格森·阿科斯塔**（Gerson Acosta）出席社区会议后，离开时身中多枪。由于他的人权捍卫者工作，他受到了威胁，国家保护局（Unidad Nacional de Protección）于是向格森·阿科斯塔提供了保护措施。⁹⁴ 格森·阿科斯塔代表自己的社区并认定他们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此外，他还代表 2001 年他的社区遭受袭击事件的受害者亲属，该袭击被称为纳亚大屠杀。

在**洪都拉斯**，**拉巴斯独立伦卡原住民运动**（Movimiento Indígena Lenca Independiente de La Paz）的人权捍卫者一直对圣埃伦娜镇（Santa Elena）附近修建水力发电厂项目的磋商过程提出质疑，并要求让当地人拥有发言权，导致社区内出现暴力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拉巴斯独立伦卡原住民运动的 5 名成员在不明情

⁸⁸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跨性别者网络（REDLACTRANS），《拉丁美洲跨性别女性人权捍卫者遭受的暴力行为和相关的有罪不罚现象》（Impunidad y violencia contra mujeres transgénero defensoras de derechos humanos en América Latina），2012 年，www.aidsalliance.org/assets/000/000/898/90624-Impunidad-y-violencia-contra-mujeres-transgenero-defensoras-de-derechos-humanos-en-América-Latina_original.pdf?1407754269。

⁸⁹ 《妇女权利发展协会向女性人权捍卫者致敬》（AWID WHRD Tribute），www.awid.org/whrd/angelica-miriam-quintanilla。

⁹⁰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致圣菲省省长豪尔赫·奥贝德的公开信》（Open letter from Amnesty International to the Governor of Santa Fe province, Sr Jorge Obeid）（索引号：AMR 13/003/2004）。

⁹¹ 国际特赦组织，《土耳其：对骄傲游行的禁令再度突破下限》（Turkey: Pride march ban is a new low）（索引号：EUR 44/1978/2015）。

⁹² 前线卫士，《同志权利捍卫者汉德·加达遭残杀》（LGBTI rights defender Hande Kader brutally murdered），2016 年 8 月 24 日，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trans-defender-brutally-murdered-turkey-august-2016。

⁹³ 全球见证组织，《地球捍卫者》，www.globalwitness.org/en-gb/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defenders-earth/。

⁹⁴ 国际特赦组织，《哥伦比亚：原住民被杀害浪潮凸显和平进程执行方面的缺陷》（Colombia: Wave of killings of Indigenous people highlights shortcomings in implementation of peace process）（新闻稿，2017 年 4 月 21 日）。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况下遇害，包括孕妇和儿童在内的人遭到警察和武装平民的袭击。另外，还有人受到威胁、任意拘押和不公起诉。⁹⁵

2017年2月，**菲律宾**奎松市（Quezon City）附近的原住民组织部落原住民受压迫团体协会（Tribal Indigenous Oppressed Group Association）秘书长**雷纳托·安格罗**（Renato Anglao）在摩托车上被3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枪杀，他的妻子和年幼孩子当时和他在一起，但二人没有受伤。部落原住民受压迫团体协会从事的工作涉及农业企业种植园侵占当地原住民祖先土地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⁹⁶

在**泰国**，社区人权捍卫者和环保人士也在极其危险和困难的环境下工作，许多人是受到大规模开发项目、自然资源开采和有毒废物污染威胁的农村或半农村社区成员。被称为比利的**弗拉池·爱琼克乔伦**（Pholachi Rakchongcharoen）在2014年4月遭到强迫失踪，这似乎和他要求当局对住在岗卡章（Kaeng Krachan）国家公园的克伦族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有关。比利当时正从他的村庄前往与克伦族村民会面，以讨论他们遭强制搬迁以及公园当局烧毁他们财产的问题，以便为一项将国家公园负责人列为被告的诉讼做准备。比利最后露面时正遭公园官员拘押，这些官员承认拘捕了他，调查人员宣布在公园的一辆车上发现血迹。比利的命运和下落仍然不明。⁹⁷

在**巴西**，为自己的土地抗争的非洲裔人士和原住民往往遭到大地主的暴力对待。马拉尼昂的查克前逃亡黑奴后裔社区领袖**弗拉维亚诺·平托·讷图**（Flaviano Pinto Neto）于2010年10月遇害，但目前还没有人被绳之以法。弗拉维亚诺·平托一直参与抗争，希望让他的社区被正式承认为“前逃亡黑奴后裔”。“前逃亡黑奴后裔”是一群被鉴定为非洲裔巴西人的定居者，受到巴西《宪法》的一定保护，包括获得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可帮助保护这些人免遭势力强大的当地农民侵权。⁹⁸土地牧灵委员会（Comissão Pastoral da Terra）称，仅在2016年，就至少有200名社区领袖因土地纠纷而收到了死亡威胁。⁹⁹2016年6月，一个在**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 do Sul state）的瓜拉尼盖约瓦社区遭到100多名武装男子的袭击；**克劳迪奥·德索萨**（Clodiodi de Souza）被枪杀，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另外6名社区成员受伤。几天前，该原住民社区重新占用他们的传统领土。在此一个月前，当局已将该领土确定为原住民土地，但尚未正式划界。¹⁰⁰

自俄罗斯联邦2014年占领和非法吞并**克里米亚**起，俄罗斯当局便将那些反对吞并的人描述为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并对他们进行起诉。作为反对派中最有组织的焦点力量，原住民**克里米亚鞑靼人**首当其冲地受到镇压。许多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反对吞并的人遭到流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受到骚扰或强迫失踪。来自克里米亚中部的**欧文·伊布拉吉莫夫**（Ervin Ibragimov）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也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世界大会（World Congress of Crimean Tatars）的成员，这个世界大会是一个促进克里米亚鞑靼人权利及推动克里米亚鞑靼文化遗产的国际组织。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6年5月；他的命运和下落仍然不明。在他失踪的那天，监控录像显示一群男子截停他的车，强迫他进入面包车后开走。多天前，他曾向朋友诉说自己被跟踪。¹⁰¹

⁹⁵ 国际特赦组织，《“我们以自己的血汗捍卫土地”：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土地、领土和环境捍卫者》（索引号：AMR 01/4562/2016）。

⁹⁶ 前线卫士，《原住民权利捍卫者雷纳托·安格罗遭暗杀》（Assassination of Indigenous rights defender Renato Anglao），2017年2月6日，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assassination-indigenous-rights-defender-renato-anglao。

⁹⁷ 国际特赦组织，《泰国：人权捍卫者最后露面一年后，家人等待正义来临》（Thailand: Family waits for justice one year since human rights defender was last seen）（索引号：ASA 39/1466/2015）。

⁹⁸ 国际特赦组织，《巴西：杀害社区领袖的人必须被绳之以法》（Brazil: Killers of community leader must be brought to justice）（新闻稿，2014年10月30日）。

⁹⁹ 土地牧灵委员会，《2016年巴西田野冲突》（Conflitos no Campo Brasil 2016），www.cptnacional.org.br/index.php/component/jdownloads/download/41-conflitos-no-campo-brasil-publicacao/14061-conflitos-no-campo-brasil-2016。

¹⁰⁰ 国际特赦组织巴西分会，《瓜拉尼盖约瓦社区遇袭导致1人死亡，数人受伤包括儿童》（Attack on Guarani-Kaiowá community leaves one dead and several wounded, including children）（新闻报道，2016年6月16日）。

¹⁰¹ 国际特赦组织，《黑暗中的克里米亚：异议遭到压制》（Crimea in the dark: The silencing of dissent）（索引号：EUR 50/5330/2016）。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2.2.5 其他受歧视群体的捍卫者

在**印度**，那些提倡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权利并反对种姓歧视的人面临持续的袭击风险，¹⁰² 遭受侵害的是达利特人（低种姓成员）和阿迪瓦西人（原住民和部落群体成员）。在几个邦，达利特人被拒绝进入公共和社会空间，并且在享用公共服务时受到歧视。根据官方统计，2015 年据报发生超过 45,000 起针对表列种姓成员的罪行，以及近 11,000 起针对表列部落的罪行。¹⁰³ 2013 年，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state）的达利特人权捍卫者**昌德拉坎特·盖克瓦德**（Chandrakant Gaikwad）遭到枪杀，据报他曾投诉行凶者对达利特人犯下罪行。昌德拉坎特·盖克瓦德是全国达利特正义运动（National Dalit Movement for Justice）的志愿者，以帮助种姓歧视受害者向地方当局提交投诉并跟踪事态进展的方式，积极支持他们讨回公道。他曾多次受到威胁。据称行凶的人过去曾被指控对达利特人犯罪，并因此被捕，但得到保释。当局没有对凶杀案进行有效调查。¹⁰⁴

印度的阿迪瓦西社区因开发导致流离失所和环境破坏，他们所受影响尤为严重。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 state）的阿迪瓦西社区领袖**贾拉尔·拉西亚**（Jailal Rathia）反对不正当获取阿迪瓦西土地的做法以及抢占土地的活动。他于 2017 年 3 月去世，他的家人怀疑他被故意投毒所致。他曾多次受到威胁，当地的土地黑帮和当地警方要求他撤回他提交的申诉书。迄今为止无人被捕。¹⁰⁵

塔赫尔·埃尔奇（Tahir Elçi）是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土耳其**东南部记录和代理侵犯人权案件。2015 年 11 月，他在不明情况下于迪亚巴克尔市被杀。塔赫尔·埃尔奇之前在电话和社交媒体上收到数以百计的死亡威胁。当他去世时，土耳其安全部队与武装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工人党）之间再次出现武装冲突不久。2015 年 10 月，他在一场电视辩论中发表评论后遭到任意拘押，并被指控“替恐怖组织进行宣传”。¹⁰⁶

在**毛里塔尼亚**，哈拉廷人和非洲裔毛里塔尼亚人等虽然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却因为在社会经济方面遭受歧视而首当其冲。博客作者**穆罕默德·穆克海提尔**（Mohamed Mkhaitir）发布了一篇博文，批评那些用伊斯兰教令毛里塔尼亚某些群体边缘化的人，却因此受到拘押并被控叛教，面临死刑。¹⁰⁷ 被拘押近 4 年后，上诉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推翻对他的死刑判决，并下令将他释放。¹⁰⁸ 2011 年 5 月，政府进行新的人口普查，以将国民身份证件系统化，许多人担心这可能导致非洲裔毛里塔尼亚人遭到任意驱逐和陷入无国籍状态，因此进行抗议。“不要动我的国籍”（Touche pas à ma nationalité）是保护非洲裔毛里塔尼亚人权利的运动，其 17 岁的成员**拉明·芒加内**（Lamine Mangane）于 2011 年 9 月在马加马市（Maghama）遭到枪击丧命，当时警察在镇压和平抗议。其他未成年人也在该次示威中受伤，包括一名 9 岁的男童。“不要动我的国籍”主席阿拉萨内·迪亚（Alassane Dia）说：“拉明·芒加内的死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担心会在全国爆发骚乱，毛里塔尼亚被迫让该国黑人更容易使用登记程序一段时间之后，才再次开始种族主义和歧视性做法。”¹⁰⁹

自 2012 年起已被判死刑一直等待行刑的**穆罕默德·阿里·阿穆里**（Mohammad Ali Amouri）属于**伊朗**阿瓦兹阿拉伯少数民族，是一名权利活动人士，也是现已解散的文化权利组织“埃尔希瓦”（Al-Hiwar）的创始成员。他仅仅因为自己在“埃尔希瓦”的和平活动，包括促进阿拉伯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有关妇女权利的社区教育，便面临这种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处罚。穆罕默德·阿里·阿穆里在伊拉克是联合国难民署已登记的难民，却从那里被非法遣返到伊朗。他被捕后在一个秘密拘押中心被单独关押了几个月，

¹⁰²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玛格丽特·塞卡格亚的报告，增编，对印度的访问（2011 年 1 月 10 日至 21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19/55/Add.1。

¹⁰³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 2016/2017 年度报告》（索引号：POL 10/4800/2017）。

¹⁰⁴ 人权捍卫者纪念网站（HRD Memorial），昌德拉坎特·盖克瓦德，<https://hrdmemorial.org/hrdrecord/chandra-kant-gaikwad/>。

¹⁰⁵ 对贾拉尔·拉西亚家人的采访，2017 年 8 月。另外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当失去土地时，我们吃煤吗？”印度的煤矿开采和侵犯阿迪瓦西人权利的行为》（“When land is lost, do we eat coal?” Coal mining and violations of Adivasi rights in India）（索引号：ASA 20/4391/2016）。

¹⁰⁶ 国际特赦组织，《在塔赫尔·埃尔奇这位土耳其人权运动的巨人的葬礼上，失落感令人振聋发聩》（At the funeral of Tahir Elçi, a giant in Turkey's human rights movement, the sense of loss is deafening）（博客文章，2015 年 11 月 30 日）。

¹⁰⁷ 国际特赦组织，《毛里塔尼亚必须立即释放被判叛教罪判处死刑的博客作者穆罕默德·穆克海提尔》（Mauritania must immediately release Mohamed Mkhaitir, blogger sentenced to death for apostasy）（索引号：AFR 38/0002/2015）。

¹⁰⁸ 国际特赦组织，《毛里塔尼亚：脸书博客作者的死刑判决被推翻》（Mauritania: death penalty for Facebook blogger quashed）（新闻稿，2017 年 11 月 9 日）。

¹⁰⁹ 对“不要动我的国籍”主席阿拉萨内·迪亚的采访，2017 年 8 月。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并称在此期间遭受了酷刑。在 2012 年的庭审中，法院不仅驳回了他指出自己受到酷刑的指称，而且依据他被迫作出的“供词”来判定他犯了“敌视真主罪”（moharebeh），并判处他死刑。¹¹⁰

2.3 特定背景下的袭击模式

人权捍卫者除了因为自己的行动和身份而成为袭击目标外，还面临一系列的侵害，视乎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如在武装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中和广泛出现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当和平集会遭到暴力镇压时，他们还面临公民空间受限和人身风险增加。

2.3.1 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

在武装冲突地区工作使人权捍卫者面临特定风险，因为平民往往由于制造恐慌和集体惩罚的策略而成为袭击目标。在某些情况下，人权捍卫者因为所做的工作而被针对，而冲突可以让人难以确定袭击者是谁或袭击动机。在有些情况下，医疗和人道援助工作者因为向冲突各方提供服务，而成为惩罚目标。即使在敌对行动正式结束后，暴力仍可持续多年，特别是在战斗人员没有被有效复员、解除武装和重新融入社会，而且政府忙于建立法治并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时。

近年来，**利比亚**的武装团体和民兵一直骚扰、绑架、用酷刑折磨和杀害人权捍卫者。记者等政治和其他活动人士及参加公共集会和示威的人不断受到袭击。**萨尔瓦·布盖吉斯**（Salwa Bugaighis）是一名律师，当推翻卡扎菲的起义开始时在组织抗议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14 年 6 月，她在班加西的家中被身份不明的凶徒枪杀。¹¹¹ 在利比亚冲突结束后，这是第一次有女性人权捍卫者被暗杀。自此以后，在没有正常运作的司法制度的情况下，犯罪活动增多，利比亚也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武装团体根据个人出身、观点和被认为的政治派别或所属部落绑架平民并索取赎金。被绑架者包括政治、人权和其他活动人士；记者；司法和其他公职人员。2016 年 9 月，在利比亚生活的苏丹活动人士**贾比尔·扎恩**（Jabir Zain）被民兵绑架，他的命运和下落仍然不明。民兵曾非正式地告诉他的家人，他被指控是无神论者、道德败坏并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合作。据信，贾比尔·扎恩因为在网上提倡妇女权利和其他人权的行动，而成为袭击目标。¹¹²

叙利亚自 2011 年冲突开始以来，冲突各方广泛犯下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叙利亚人权网络（Syrian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称，自 2011 年以来，约 75,000 人遭到叙利亚政府强迫失踪，超过 2,000 人被武装反对派团体拘押后失踪。¹¹³ 在冲突期间，公民社会和与人权捍卫者遭到迫害和袭击，包括记者、人道和医疗保健提供者。人权律师**哈利勒·马图克**（Khalil Ma'touq）于 2012 年 10 月失踪，当时他在大马士革驾车前往工作，沿路有几个政府设立的检查站。虽然非官方消息人士后来在几个不同的拘留所看见过他，但他的家人自 2013 年 9 月起便没有收到任何更新。2013 年 12 月，人权捍卫者**拉赞·扎伊图娜**（Razan Zaitouneh）、**萨米拉·哈利勒**（Samira Khalil）、**瓦埃尔·哈马达**（Wa'el Hamada）和**纳兹姆·哈马迪**（Nazem Hamadi）在侵害记录中心（Violations Documentation Center）的办公室被一群武装男子从绑架，此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他们。该中心是当地的人权监察组织，位于大马士革郊外的杜马，该地区当时由武装反对派团体控制。¹¹⁴

在**伊拉克**国内冲突中，政府军、准军事民兵和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继续犯下战争罪，以及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严重侵犯平民人权的行。在该背景下，包括记者在内的人权捍卫者极易受到袭击。人

¹¹⁰ 国际特赦组织，《陷于镇压的网中：伊朗的人权捍卫者遭到攻击》（Caught in a web of repression: Iran'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under attack）（索引号：MDE 13/6446/2017）。

¹¹¹ 国际特赦组织，《利比亚必须确保适当调查著名律师遭枪杀事件》（Libya must ensure proper investigation after prominent lawyer shot dead）（新闻稿，2014 年 6 月 26 日）。

¹¹² 国际特赦组织，《利比亚：活动人士遭受酷刑并面临驱逐危险——贾比尔·扎恩》（Libya: Activist tortured and at risk of expulsion – Jabir Zain）（索引号：MDE 19/5426/2017）。

¹¹³ 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数以万计的失踪者不能被遗忘》（Syria: Tens of thousands of disappeared must not be forgotten）（新闻稿，2017 年 8 月 30 日）。

¹¹⁴ 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3 年后被绑架的活动人士仍下落不明，没有关于杜马 4 人的消息》（Syria: Abducted activists' whereabouts remain unknown 3 years on, no word on Douma 4）（索引号：MDE 24/5311/2016）。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权律师**萨米拉·萨莱·埃尔奈米** (Samira Saleh Al-Naimi) 在家中被绑架，后来于 2014 年 9 月在摩苏尔被公开处决。她在该市以保护被拘留者和支持弱势家庭而闻名。没有人因为谋杀她而被绳之以法。¹¹⁵

在**哥伦比亚**，自政府与最大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于 2016 年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受到威胁和杀害的人权捍卫者人数日益增加，当中以原住民、非洲裔、土地权和环境活动人士尤甚。¹¹⁶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2016 年该国有 59 名人权捍卫者遇害，¹¹⁷ 而在 2017 年头 6 个月，哥伦比亚非政府组织“我们是捍卫者” (Somos Defensores) 报告称有 51 名人权捍卫者遇害。¹¹⁸ 大多数人的死与涉及土地、领土、环境的地方冲突和有罪不罚现象居高不下有关。2017 年 6 月，非洲裔哥伦比亚被迫流离失所受害者领袖兼非洲裔哥伦比亚流离失所者协会 (Association of Displaced Afro-Colombians) 成员**贝纳尔多·库埃罗** (Bernardo Cuero) 遇害。他因捍卫非洲裔哥伦比亚人的权利而遭到准军事组织迫害，后来于 2000 年被迫流离失所，此后曾多次遭到威胁。他获政府保护了一段时间，但控诉当局未有效调查对他的威胁和袭击，让他有可能遭受更多的暴力。总检察长办公室目前在调查他的谋杀案，一人已被拘押。

哥伦比亚圣何塞阿帕塔多和平社区 (Peace Community of San José de Apartadó) 的居民一直遭受冲突各方的袭击、酷刑、性侵犯，并被迫流离失所。数以百计的人遇害。该社区于 1997 年在安蒂奥基亚 (Antioquia) 成立，正式拒绝让军队、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进入其领土，以保护其居民不受暴力侵害。自 2016 年底以来，该社区称该地区的准军事组织活动有所增加。¹¹⁹

2.3.2 有组织犯罪和广泛的暴力

有组织犯罪给人权捍卫者构成威胁，因为犯罪团伙往往用暴力手段来控制领土，并对任何干涉其利益的行动者进行报复。当国家试图打击此类犯罪网络时，尤其是以军事方式维持治安，或官员与犯罪集团勾结，也可能造成危险的环境，使人权捍卫者有可能成为国家行为体和犯罪行为体的袭击目标。

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有时与国家共谋或在国家的默许下行事，再加上高凶杀率和有罪不罚现象，使情况更为恶化，¹²⁰ 当中以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社区受到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年轻人和那些挺身捍卫社区的人。¹²¹ 在此背景下，人权捍卫者往往很难确定威胁来自哪里。当局很快便将对人权捍卫者的袭击称为普通犯罪，而不是试图查明他们的人权活动是否可能是袭击背后的动机。例如，批评政府侵害行为的洪都拉斯记者**菲利克斯·莫利纳** (Félix Molina) 是 2016 年 5 月的两起袭击事件的目标，在第二次袭击中双腿遭到枪击。尽管他曾在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信息，显示一些政界人士、军方和商人可能参与杀死贝塔·卡塞雷斯 (Berta Cáceres)，但当局仍将两次袭击视为普通抢劫。¹²²

在杜特尔特总统于 2016 年在**菲律宾**掌权，并宣布“禁毒战争”之后，警察和自发治安人员已杀死数以千计被指是毒品罪犯的人。记录执法人员侵犯人权的人权捍卫者和其他批评这种做法的人经常遭到骚扰。

¹¹⁵ 海湾人权中心 (Gulf Center for Human Rights)，《伊拉克：律师兼人权捍卫者萨米拉·萨莱·埃尔奈米在摩苏尔被伊斯兰国处决》 (Iraq: Lawyer and human rights defender Samira Saleh Al-Naimi executed by ISIS in Mosul)，2014 年 9 月，www.gc4hr.org/news/view/758。

¹¹⁶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 2016/2017 年度报告》 (索引号：POL 10/4800/2017)。

¹¹⁷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哥伦比亚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2017 年 3 月 14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34/3/Add.3。

¹¹⁸ “我们是捍卫者”项目，《吸一口气！他们在杀我们，2017 年 1 至 6 月的报告，关于哥伦比亚人权捍卫者受到的攻击的信息》 (¡Agúzate! que nos están matando, Informe enero – junio 2017, Sistema de información sobre agresiones contra defensores y defensoras de DDHH en Colombia)，2017 年，<https://somosdefensores.org/images/informe-semestral-enero-junio-2017-SIADDHH.pdf>。

¹¹⁹ 国际特赦组织，《哥伦比亚：针对和平社区的攻击事件激增表明冲突仍然存在》 (Colombia: Spike in attacks against peace community shows conflict still alive) (新闻报道，2017 年 2 月 7 日)。

¹²⁰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3 年全球凶杀研究：趋势、背景和数据》 (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2013: Trends, Contexts, Data)，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GSH2013/2014_GLOBAL_HOMICIDE_BOOK_web.pdf。

¹²¹ 国际特赦组织，《温馨的家？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与萨尔瓦多在深化难民危机方面的角色》 (Home sweet home? Honduras, Guatemala and El Salvador's role in a deepening refugee crisis) (索引号：AMR 01/4865/2016)。

¹²² 世界反酷刑组织 (OMCT)，《洪都拉斯：菲利克斯·莫利纳被谋杀企图两次》 (Honduras: Doble intento asesinato contra Félix Molina)，2016 年 5 月 6 日，www.omct.org/es/human-rights-defenders/urgent-interventions/honduras/2016/05/d23753/。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¹²³ 杜特尔特总统在 2017 年 8 月公开威胁人权捍卫者，称将对那些批评禁毒运动的人发起刑事调查，并告诉警方“如果他们（人权组织成员）妨碍司法公正，你们就向他们开枪。”¹²⁴

墨西哥也采取军事方式对付贩毒问题，当局依靠武装部队执行与公共安全有关的任务。在此背景下，数十名人权捍卫者被杀害，其中包括在不安全和暴力大气候笼罩下的受害者亲属、记者和其他活动人士。**何塞菲娜·雷耶斯**（Josefina Reyes）积极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有组织犯罪背景下出现的暴力及军方侵犯人权的行。2009 年 8 月，她参加了一个关于军事化和镇压问题的论坛，抗议军方成员日益增多的侵犯人权行为。几个月后，即 2010 年 1 月，她在奇瓦瓦州（Chihuahua state）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杀害。她的几个亲戚后来都遇害，包括她在 2010 年 8 月遇害的兄弟**鲁本·雷耶斯**（Rubén Reyes），以及被绑架后来在 2011 年 2 月被发现死亡的妹妹**马莱娜·雷耶斯**（Malena Reyes）、兄弟**埃利亚斯·雷耶斯**（Eliás Reyes）和嫂嫂**路易莎·奥内拉斯**（Luisa Ornelas）。在她们的母亲要求为家人讨回公道后，她的房子在同一个月遭到一个武装团伙纵火焚烧。¹²⁵

2.3.3 暴力镇压和平抗议

参加公共集会、进行和平抗议和采取集体行动是反抗不公和争取人权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组织还是参与的人权捍卫者所面临的威胁都较高。多个国家的做法表明侵犯和平抗议者人权的行持续存在，包括使用不必要和过度武力导致人们死亡。

在**西非和中非**许多地区，人权捍卫者在不允许异议的背景下工作。当政治权力受到挑战时，包括在选举和公投期间，加剧的紧张局势往往会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导致人权受到压制。从 2014 年至今，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 305 人在抗议期间遭非法杀害的案件，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抗议中受伤，事发地包括**尼日利亚、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刚果共和国和多哥**。绝大多数杀人事件是军队等安全部队所为，他们使用催泪弹、警棍和实弹来驱散抗议者，或用装甲车冲击人群。¹²⁶

2016 年 8 月，在**埃塞俄比亚**，安全部队在奥罗米亚（Oromia）区域各地和阿姆哈拉（Amhara）部分地区向和平示威者发射实弹，导致至少 97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当时有数以千计的人要求政治改革、正义和法治。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北部城市巴赫达尔（Bahir），一天之内至少有 30 人被杀。¹²⁷

在**委内瑞拉**，安全部队企图阻止和平示威，并在 2014 和 2017 年针对政府的抗议中使用了不必要和过度的武力。多批武装平民据报也伤害示威者，其中一些人据称得到政府支持。自从爆发新的抗议以来，官方消息来源透露 2017 年 4 至 7 月至少有 91 人丧生，逾 1,400 人受伤，其中一些人没有参与抗议。政府经常对人民非法使用武力，设立国家机制专门用于暴力镇压异议，并反复发表煽动暴力的言论，以上种种似乎都是其压制批评的政策的一部分。¹²⁸

在**巴西**，警察进行法外处决的问题极为常见。军警在禁毒行动中不必要和过度地使用致命武力，特别是在贫民窟和其他边缘化社区，在过去 10 年间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2014 年 4 月，**埃迪尔森·席尔瓦·多斯桑托斯**（Edilson Silva dos Santos）在里约热内卢被枪杀，他当时正对军警于几小时前杀死一名当地舞者的事件进行和平抗议。¹²⁹

¹²³ 国际特赦组织，《“如果你是穷人就会被杀”：菲律宾“反战争”中的法外杀戮事件》（‘If you are poor, you are killed’: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war on drugs）（索引号：ASA 35/5517/2017）。

¹²⁴ 人权观察，《菲律宾：杜特尔特威胁人权社区》（Philippines: Duterte threatens human rights community），2017 年 8 月 17 日，www.hrw.org/news/2017/08/17/philippines-duterte-threatens-human-rights-community。

¹²⁵ 国际特赦组织，《家属抗议时住所被烧毁》（Home burnt down as family protest）（索引号：AMR 41/006/2011）。

¹²⁶ 国际特赦组织，《因挺身直言而被关闭：西非和中非的人权捍卫者面临风险》（Shut down for speaking ou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t risk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索引号：ACT 30/6170/2017）。

¹²⁷ 国际特赦组织，《埃塞俄比亚：警方对和平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造成数十人死亡》（Ethiopia: Dozens killed as police use excessive force against peaceful protesters）（新闻稿，2016 年 8 月 8 日）。

¹²⁸ 国际特赦组织，《委内瑞拉：致命暴力，扼杀异议的国家政策》（新闻稿，2017 年 7 月 10 日）。

¹²⁹ 国际特赦组织，《巴西：“你杀了我儿子”——军警在里约热内卢市的杀戮行为》（Brazil: ‘You killed my son’: Homicides by military police in the city of Rio de Janeiro）（索引号：AMR 19/2068/2015）。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在**阿根廷**，库沙门（Cushamen）的马普切（Mapuche）原住民社区普罗夫雷斯滕西亚（Pu Lof en Resistencia）与南阿根廷土地公司（Compañía de Tierras del Sur Argentino）卷入一场土地权纠纷中，该公司拥有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片土地。安全部队一再袭击该社区，以图阻止他们抗议和提出申诉。2017年8月，军警进入马普切领土，据报发射了实弹和橡皮子弹，并烧毁许多家庭的财物。活动人士**圣地亚哥·马尔东纳多**（Santiago Maldonado）在该行动中失踪，他在前一天抵达该地以支持社区。¹³⁰ 10月，他的尸体在附近被发现，该案的调查正在进行中。¹³¹

在当局不保护和平示威者免遭暴力对待，反而对他们非法使用武力时，这向其他人传递了令人心寒的信息，尤其，对那些用和平集会来支持其人权主张的人权捍卫者来说也是一种预警。

2.4 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受到的对待

在一些国家，被任意拘押的人权捍卫者因为他们工作而遭到报复，受到额外形式的惩罚，包括被拒绝提供医疗服务以致他们有可能死亡，以及不准他们与外界接触而有可能构成强迫失踪。国家当局有义务确保所有被拘押者的福祉：《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规定，“对待所有囚犯，均应尊重其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规则1）。特别是“囚犯应享有的医疗保健标准应与在社区中能够享有的相同，并应能够免费获得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不因其法律地位而受到歧视”（第24条）；“囚犯应准在必要监督之下……经常同亲属和朋友联络”（规则58）；而且“应当……提供适当机会、时间和设施，以便其在不受拖延、阻拦或审查且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自己选择的法律顾问或法律援助提供者的探访并……与之沟通和咨询”（规则61）。¹³²

人权捍卫者**努里丁·朱马尼阿佐夫**（Nuriddin Dzhumaniazov）于2016年12月死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监狱中；他去世的消息在6个月后才被公布。他创立了“马兹勒姆”（“Mazlum”）人权中心，并帮助成立独立工会支持移徙劳工联盟（Un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to Support Labour Migrants）。他于2014年1月被捕，并与他的同事**法克里丁·提勒耶夫**（Fakhriddin Tillayev）一起被诬告贩运人口，二人在不公审判后被判处长期徒刑。努里丁·朱马尼阿佐夫患有严重糖尿病，并于2014年4月请他的律师**宝琳娜·布劳内格**（Polina Braunerg）提供药物。当她试图把药物送去给他时，被告知他被转移到监狱医院设施，但当局拒绝让她知道他所在的确切地点。其后，当她提出投诉时，却收到匿名死亡威胁。¹³³ 宝琳娜·布劳内格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著名人权律师，因为这起案件而受到巨大压力，后来于2017年5月死于中风。她曾被禁止出国求医，并在投诉时被当局威胁会拘捕她。¹³⁴

乌兹别克斯坦的另一位人权捍卫者**阿卜杜拉苏尔·库代纳扎洛夫**（Abdurasul Khudainazarov）于2014年6月去世，3周之前，他才因健康理由而从监狱获释，当时他已患有晚期癌症、淋巴瘤和肺结核。他在拘押期间遭受了酷刑和虐待。他的家人还称，尽管8年来多次请求而且有明确迹象显示他的健康日益严重恶化，但监狱官员一再拒绝为他的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提供必要治疗。他在被捕之前领导人权组织“埃兹古里克”（Ezgulik），并以打击警察和安全部门贪污腐败的工作而闻名。2005年7月，他在安集延市（Andijan）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后的镇压中，安全部队在该市枪杀了数以百计主要为和平抗议者的人。他因为勒索和诈骗的罪名被判处9年多有期徒刑；这次判刑被普遍认为不公平，并且是为了报复他的反腐工作。¹³⁵

¹³⁰ 国际特赦组织，《阿根廷：马普切社区内的强迫失踪——圣地亚哥·马尔东纳多》（Argentina: Forced disappearance in Mapuche community - Santiago Maldonado）（索引号：AMR 13/6907/2017）。

¹³¹ 国际特赦组织，《阿根廷：当局必须保证为圣地亚哥·马尔东纳多伸张正义》（Argentina: Authorities must guarantee justice for Santiago Maldonado）（新闻稿，2017年10月20日）。

¹³²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2016年1月8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RES/70/175。

¹³³ 中亚人权协会（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Central Asia），《乌兹别克斯坦：68岁的人权捍卫者努里丁·朱马尼阿佐夫拘押期间死亡》（Uzbekistan: 68-year old human rights defender Nuriddin Jumaniazov dies in detention），2017年6月20日，www.ahrca.eu/uzbekistan/defenders/958-uzbekistan-68-year-old-human-rights-defender-nuriddin-jumaniazov-dies-in-detention。

¹³⁴ 中亚人权协会，《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应对乌兹别克律师宝琳娜·布劳内格之死承担责任》（The Uzbekistani authorities should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ath of Uzbek lawyer Polina Braunerg），2017年5月19日，<http://www.ahrca.eu/uzbekistan/defenders/923-the-uzbekistani-authorities-should-accept-responsibility-for-the-death-of-uzbek-lawyer-polina-braunerg>。

¹³⁵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2014/2015年度报告》（索引号：POL 10/0001/2015）；人权观察，《乌兹别克斯坦：病危的活动人士获释》（Uzbekistan: Critically ill activist freed），2014年6月5日，www.hrw.org/news/2014/06/05/uzbekistan-critically-ill。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在**中国**，当局经常拒绝为人权捍卫者提供医疗护理，以此削弱或惩罚他们，这种做法也是当局更广泛地虐待此类被拘者的一部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家兼人权捍卫者**刘晓波**被转送医院几个星期后，在2017年7月死于肝癌。他没有获准到国外接受治疗，在医院仍受严密监视。他与其他人共同签署呼吁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后，在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刘晓波过去曾因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挑战中国的西藏政策后于1996年被拘押。在他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局有系统地骚扰和恐吓刘晓波的家人和支持者。

中国的女性人权捍卫者**曹顺利**被拘押5个月后，于2014年3月在北京一家医院因器官衰竭死亡。她患有肺结核、肝硬化和子宫肌瘤，她的家人一再要求让她接受治疗，但都遭拒绝。2013年9月，她在试图前往日内瓦参加一个人权培训项目时遭任意拘押。据信她因为与其他行动者在中国外交部外一起组织静坐抗议，而受到“寻衅滋事”的指控。她的家人未获准去看她的遗体和医疗记录。¹³⁶

六四天网是**中国**少数记录和报告人权侵犯指控的网站之一，其联合创始人**黄琦**自2016年11月以后一直被拘禁。被拘一个月后，他被正式指控“泄露国家机密”。他在2017年7月才首次获准与他的律师见面，当时他称自己在拘押期间遭到虐待。自从黄琦被拘后，他的体重下降了10公斤，并患有肾病、脑积水和其他心肺疾病。黄琦得到了治病药物，但目前不清楚他是否有获得适当的治疗。¹³⁷

阿拉什·萨德基 (Arash Sadeghi) 2016年6月开始在**伊朗**服刑，两项罪名合共19年刑期。他因为捍卫人权而受惩罚，包括与国际特赦组织联系和开展反对死刑的运动。阿拉什·萨德基在2017年1月结束了长时间的绝食之后病危。他患有消化系统并发症和呼吸道问题、肾功能衰退、长期恶心、心律失常和哮喘，并且因胃溃疡而不能吃固体食物。他需要长期住院，以便他的健康问题可得到专门治疗，这些问题是他长期绝食造成的，更由于持续缺乏适当医疗护理而加剧。尽管他急需治疗，但伊朗当局仍拒绝批准阿拉什·萨德基从监狱转到医院。在这种情况下蓄意拒绝让他获得适当治疗的行为构成酷刑，并使他的生命陷入危险。¹³⁸

在**阿塞拜疆**，活动人士兼博客作者**梅罕·卡兰达罗夫** (Mehman Qalandarov) 在2017年4月被发现吊死于他的牢房中。两名活动人士因为在总统的父亲盖达尔·阿利耶夫 (Heydar Aliyev) 的纪念碑上喷政治标语而被监禁，梅罕·卡兰达罗夫于脸上发文声援二人，不久之后在2017年2月被捕，被控持有毒品，并被拘押候审。那些批评阿塞拜疆政府的人遭到报复，经常被当局以捏造的毒品罪名拘捕。根据当局的一份官方声明，梅罕·卡兰达罗夫在他的同监狱友午睡时，用一块布自缢身亡。当地一名曾在同一拘留所被关押一年多的人权捍卫者质疑该说法，并称：“在这些牢房里不可能上吊自杀。”一些人权捍卫者亦指梅罕·卡兰达罗夫遭到了刑讯逼供，当局还秘密埋葬他的尸体以隐藏证据。¹³⁹

曾获奖的人权捍卫者兼博客作者**艾哈迈德·曼苏尔** (Ahmed Mansoor) 于2017年3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联酋) 的家中被捕，自此以后便被任意拘押在阿布扎比，之后再在一个秘密地点被关押了两个星期。4月，他的家人在监督下短暂探访了他，此后他一直遭到单独监禁，无法与律师或家人联系，以上种种可能构成强迫失踪。根据阿联酋官方新闻社的报道，艾哈迈德·曼苏尔被指控利用社交媒体网站“发布虚假信息和谣言”，“宣传宗派主义和煽动仇恨的议题”，以及“发布危害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并损害国家声誉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2017年3月，几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阿联酋拘押艾哈迈德·曼苏尔的做法，并要求该国立即释放他，因为他们认为他被捕“是对阿联酋人权捍卫者合法工作的直接攻击”。¹⁴⁰

2017年1月，南苏丹的律师兼人权活动人士**东·塞缪尔·卢阿克** (Dong Samuel Luak) 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失踪。一天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成员**阿格利·伊德里** (Aggrey Idri) 也在内罗毕失踪。尽管南苏

activist-freed。

¹³⁶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曹顺利的遗体失踪后恐真相被隐藏》(China: Fear of cover-up as Cao Shunli's body goes missing) (新闻稿，2014年3月26日)；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当局对活动人士之死负有责任》(China: Authorities have 'blood on their hands' after activist's death) (新闻稿，2014年3月14日)。

¹³⁷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更多信息——网站创办人关押期间受虐》(索引号：ASA 17/6938/2017)。

¹³⁸ 国际特赦组织，《陷于镇压的网中：伊朗的人权捍卫者遭到攻击》(索引号：MDE 13/6446/2017)。

¹³⁹ 国际特赦组织，《阿塞拜疆必须保护生命权并有效调查关押中死亡的事件》(Azerbaijan must protect the right to life and effectively investigate deaths in custody) (索引号：EUR 55/6225/2017)。

¹⁴⁰ 国际特赦组织，《阿联酋：释放以言入罪而被关押的著名维权者艾哈迈德·曼苏尔》(UAE: Free prominent rights defender Ahmed Mansoor held on speech-related charges) (索引号：MDE 25/6094/2017)。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丹和肯尼亚两国的官员皆否认关押了他们，也没有就他们的下落提供任何消息，但可靠的消息来源表示，二人被肯尼亚当局拘押，并被带到**南苏丹**朱巴的一座监狱。两人的命运和下落目前不明。东·塞缪尔·卢阿克是一名已登记的难民，被驱逐出境到南苏丹的话会使他的生命陷入危险，这种做法违反了《难民公约》。东·塞缪尔·卢阿克和阿格利·伊德里都敢于批评南苏丹政府。人们普遍认为，南苏丹和肯尼亚两国的安全机构参与了这两起构成强迫失踪的事件。¹⁴¹

¹⁴¹ 国际特赦组织，《两名男子的命运和下落不明》（Fate and whereabouts of two men unknown）（索引号：AFR 65/6298/2017）。

3. 人权捍卫者被杀害和强迫失踪造成的持久影响

威胁到人权捍卫者生命的袭击，给他们的朋友、家人、同事、其他人权捍卫者和整个社会带来连锁影响。与受害者关系最密切的人受到极大的心理创伤，可能在应对时遇到实际困难。恐惧感和绝望感渗入其他人权捍卫者内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区。随着其他人权捍卫者受到恐吓，并由于害怕遭到报复而无法开展工作，权利受到侵犯的人和社区发现无人能为他们发声和提供保护。要是那些袭击人权捍卫者的人不被追究责任的话，情况会进一步恶化，造成暴力和有罪不罚的恶性循环，使其他人面临更多风险。

与此同时，受害者家人和其他人权捍卫者往往会感到愤慨，渴望讨回公道和寻求真相。他们呼吁为他们提供保护以免受更多袭击，但也要求就所受到的伤害讨回公道和得到适当补偿，并推动有关方面作出改变，以确保为所有人权捍卫者创造一个安全和有助于他们发挥能力的环境。

3.1 对家人和朋友的影响

遇害人权捍卫者的家人和朋友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这是由于丧亲之痛以及由此而无可避免地遇到的实际困难，包括经济困境、相关的污名和害怕成为下一个袭击目标的恐惧。这些情绪可能持续终生。

土耳其人权律师**塔赫尔·埃尔奇**在2015年遇害，他的妻子**图坎·埃尔奇**（Türkan Elçi）痛苦地讲述了爱人去世后造成的心理创伤。图坎·埃尔奇在一年后写到她的感受：“我记得当时想这一切都是梦：当黎明的曙光穿过窗帘时，我会在塔赫尔身边醒来，我会告诉他这件事……这种幻想他的死只是一场梦的心理欺骗持续了3天……在梦境消失后，塔赫尔去世带来的痛苦像寒冬一样来临，使我感到彻骨寒冷……就像是将一根手指压在疼痛的伤口上：一个现在仍未愈合的伤口，一年后依然让我疼得大声尖叫。”¹⁴² 在塔赫尔去世后不久，一名警官在推特上对图坎发文称“你是下一个”。迄今为止，他的死因调查仍未结束。图坎在一次纪念塔赫尔逝世的活动中说：“没有人宣称对谋杀塔赫尔的事件负责，我们可以说这个事实表明，凶手们在纯洁、无辜和勇敢的塔赫尔面前变得害怕。”¹⁴³

¹⁴² 国际特赦组织，《图坎·埃尔奇：从冬眠中醒来——塔赫尔·埃尔奇遭谋杀后一年》（Awakening from the winter sleep – a year on from Tahir Elçi's murder），作者：图坎·埃尔奇（博客文章，2016年11月28日）。

¹⁴³ 《自由日报》（Hurriyet Daily News），《迪亚巴基律师协会负责人埃尔奇在被谋杀周年为人铭记》（Slain Diyarbakır bar head Elçi remembered on anniversary of murder），2016年11月28日，www.hurriyetdailynews.com/slain-diyarbakir-bar-head-elci-remembered-on-anniversary-of-murder.aspx?pageID=238&nid=106646。

埃斯特·基奥贝勒 (Esther Kiobel) 在**尼日利亚**军事独裁时期的经历仍然带来影响。**她的丈夫巴里奈姆·基奥贝勒** (Barinem Kiobel) 是一名政府官员和奥格尼人，在一场虚假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并于1995年与8名奥格尼人生存运动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 的活动人士一起被处决，其中包括作家兼环保人士**卡山伟华** (Ken Saro-Wiwa)。这些人所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对抗一些石油公司 (特别是壳牌公司)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造成的污染，并因此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巴里奈姆·基奥贝勒虽然不是奥格尼人生存运动的活动人士，但也对该问题表示关切。埃丝特的丈夫被捕和处决后，她直接受到了影响，并在自己的社区中遭到鄙视贬斥。她失去了在餐饮业的工作，她说原因是“每个人都把我看作是杀人犯的妻子”。她有4个孩子，没有收入，生活变得艰难得多，但她强迫自己“继续向前和抗争”。当她第一次去监狱探望巴里奈姆时，遭到看守她丈夫的指挥官袭击。巴里奈姆遭处决后，她经济困难，并被警告说她应该为了自己和孩子安全离开尼日利亚。她到了贝宁成为难民，最终在美国获得庇护。如今，在22年后，她无法放下家庭过去遭遇的事，她说：“我几乎每天都会卧室内回忆过去并哭起来，但后来我建立起信心，而且决定要坚强。”埃斯特·基奥贝勒知道她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讨回公道，多年来试图在美国法院起诉壳牌公司，现在还在荷兰起诉该公司，她认为该公司对丈夫的死负责。她坚决要求洗刷巴里奈姆的冤屈。“他在历史上是一个罪犯，”她说，但“他不是，他是一个好人、好父亲、好丈夫、好兄弟。我希望他被宣告无辜。”¹⁴⁴

苏兹瓦蒂 (Suciwati) 是一名**印度尼西亚**人权捍卫者，是2004年遇害的**慕尼尔·萨义德·塔里**的妻子。她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的死) 让许多他的朋友极为悲痛，对家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他维持我们家的生计，是一家之主。”在慕尼尔去世后不久，苏西瓦蒂收到威胁，其中包括一个装着死鸡头的包裹，里面一张纸条写着：“如果你胆敢把 TNI (军队) 牵扯进来，你就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其他提出为慕尼尔案伸张正义的组织也收到相同的包裹。2008年，警察来到她孩子的学校并问问题。她说：“我们当然感到害怕……还有一些匿名人士打电话来询问慕尼尔的案子，特别是当案子受到媒体报道时。”她还感到污名和侮辱所造成的压力，因为她被指控为引人注目、渴望权力和“发死人财”。她说：“像我这样的遗孀在印度尼西亚的形象不好，但我总是对媒体说‘称呼我为慕尼尔的妻子苏西瓦蒂，而不是慕尼尔的遗孀苏西瓦蒂’，因为我从不想成为寡妇，他是被强行从我身边带走。”¹⁴⁵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布卡武 (Bukavu)，人权组织“正义继承者” (Héritiers de la Justice) 秘书长**帕斯卡尔·卡本古卢** (Pascal Kabungulu) 于2005年在家人面前被枪杀。该组织现任执行秘书**杰拉德·夸里瓦萨** (Gérard Kwigwasa) 对国际特赦组织说：“在帕斯卡尔被暗杀后，他的家人遭到恐吓，被迫逃离本国并前往乌干达，因为他们在刚果不再安全。而在他们出国后，与帕斯卡尔及他的案件相关的专业人员就转而受到威胁和恐吓。例如，代理帕斯卡案件的律师开始收到威胁，人权捍卫者因而感到担忧。此外，一些记者被停职，因为他们可以说出事实和刚果广泛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¹⁴⁶ 他的妻子**黛博拉·基图迈尼** (Deborah Kitumaini) 现在和孩子在加拿大生活，她知道从事人权工作的危险，但解释说：“这并不能防止我们出现恐惧悲伤情绪或创伤后应激反应，哪怕这些感觉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略为变弱。10年后，这起事件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看到警察和军队制服时，我的心仍会跳得更快，我们到加拿大境外时仍感到不安。”在帕斯卡尔被谋杀之前，她也一再遭到威胁，目的是要恐吓他：安全人员“会来敲我们的门”。在他去世后，“穿着制服的武装男子来到我的工作场所找我，在孩子们和我一个人的时候在我们家周围徘徊。”¹⁴⁷ 黛博拉被迫逃离该国，走的时候差不多放弃了一切。

阿根廷人权捍卫者**桑德拉·卡布雷拉**于2004年在罗萨里奥市遇害，她的同事兼朋友**埃琳娜·伊娃·雷纳加** (Elena Eva Reynaga) 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性工作者网络 (Red de Mujeres Trabajadoras Sexuales de Latinoamérica y el Caribe) 执行秘书。她在被问及事件对她的影响时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她的朋友遇害“使她多年来要接受治疗”。¹⁴⁸ 埃琳娜和她的同事非常想念桑德拉：“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你需要有很强的个性来挺身对抗警察。”埃琳娜本人一再受到威胁，她承认“你需要有点疯狂才能继续捍卫人权”。

¹⁴⁴ 国际特赦组织，《一名妇女对抗壳牌公司》 (One woman vs Shell) (报道，2017年6月)，www.amnesty.org/en/latest/campaigns/2017/06/one-nigerian-widow-vs-shell/。

¹⁴⁵ 对苏兹瓦蒂的采访，2017年7月。

¹⁴⁶ 对“正义继承者”执行秘书杰拉德·夸里瓦萨的采访，2017年7月。

¹⁴⁷ 加拿大国际正义中心 (Canad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为纪念我的丈夫帕斯卡尔·卡本古卢而提出投诉”》 (DRC: 'I am filing a complaint in the memory of my husband, Pascal Kabungulu')，2016年，www.cci-j.ca/cases/kabungulu/。

¹⁴⁸ 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性工作者网络执行秘书埃琳娜·雷纳加的采访，2017年7月。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在桑德拉遇害后，埃琳娜觉得自己和其他维护性工作者权利的人从当局那里得到的支持不多。在这种害怕遭到报复的氛围中，罗萨里奥的地方活动人士被迫停止工作。

古斯塔沃·卡斯特罗·索托 (Gustavo Castro Soto) 是**贝尔塔·卡塞雷斯**的朋友，也是卡塞雷斯 2016 年遭谋杀时的唯一证人。索托是一名墨西哥人权捍卫者，不得不面对不断的恐吓和威胁。他在袭击发生的那个夜晚险些丧命：“当杀手到达时，我遮住了自己的脸。他离我 3 米远。当他开枪时，我挪开了身子，子弹擦过我的耳边。他以为已经杀了我了。我能活下来是个奇迹。”然而，朋友遇害只是古斯塔沃痛苦的开始。尽管他知道自己出庭作证会有危险，但洪都拉斯当局没有为他提供适当保护。他被阻止离国一个月，实际上被当作该案的嫌疑人。“一个月后，负责此案的法官暂停了我的律师的工作。他们侵犯了我的所有权利。我每天都很害怕。我认为自己随时都可能出事，觉得自己像个替罪羊。”¹⁴⁹

在贝尔塔·卡塞雷斯去世一年后，针对谋害她的人进行的起诉工作进展缓慢，当局也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为其他处于险境的人权捍卫者提供有效保护。贝尔塔的死让她的家人以及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极为悲痛。她的女儿**贝莎·苏尼加** (Bertha Zúniga) 说：“他们不只是想杀了她，更想扼杀该组织，让它消失……但他们错了。”她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全职参与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工作。¹⁵⁰她说，母亲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对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多少也有心理准备，我们在组织方面有经验，而且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给我们提供了支持。我的妈妈从小就带我一起参加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所有培训和组织活动，所以我与这个运动一起长大，这也是我能上的最棒学校……我只是许多参与该组织的年轻维权者中的一员。”她也相信团结和“集体而非个人努力”的重要性，而且“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尊严。我们不是受害者，而是拥有力量的行动者，在最艰难的时刻奋起抗争。”¹⁵¹

哥伦比亚非政府组织“我们是捍卫者”的人权捍卫者**莱昂纳多·迪亚兹** (Leonardo Díaz) 说，除了情绪困扰和实际困难外，人权捍卫者被杀害也可能导致“家庭成员遭社会鄙视，以致家庭丧失身份，尤其是当人权捍卫者被杀害是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有关时。此外，当国家称维权者的死与他们的人权活动无关时，家属会再次受到伤害。这样做是为了将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去政治化，并减轻国家在保护他们生命的责任。”¹⁵²

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也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强迫失踪的独特之处在于长期无法确定挚爱的命运和下落，由此而可能导致持续的痛苦，使家人和朋友难以适应这种痛苦和开始恢复正常生活。这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也有实际影响，特别是在法律不保护失踪者亲属的国家，当中可能包括亲属在财务、行政和法律方面遇到的困难（例如享有福利或继承遗产方面），如果司法制度要求失踪者的亲属在提供死亡证明后才启动调查或起诉，甚至会在寻求司法救助方面出现困难。¹⁵³

叙利亚人权捍卫者**巴塞尔·卡塔比尔**在 2012 年被拘押，并于 2015 年 10 月遭强迫失踪，他的亲友多年来无法确定其命运和下落，他死亡的消息在 2017 年才被公布。在知道他的命运之前，接近巴塞尔的一名人士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我对不明情况感到极度恐惧……我持续感到焦虑和困惑。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在等吗？他在那里吗？但我试着像巴塞尔还在那里一样过活……我的情绪起伏。有时候我觉得巴塞尔还活着，有时我觉得不是。有时候我觉得他会回来。有时我觉得我在精神上与他沟通，并感受到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作为活动人士和被拘押者的巴塞尔对我来说比作为亲友的巴塞尔更重要，他的案子比我个人对他的依恋更重要。”¹⁵⁴

叙利亚律师**哈利勒·马图克**的女儿**拉尼姆·马图克** (Raneem Ma'touq) 描述了父亲被强迫失踪的事如何影响她：“他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巨大的空洞……没有了他的生活就像活在地狱一样。他总是保护我的

¹⁴⁹ 国际特赦组织，《贝尔塔·卡塞雷斯谋杀案的唯一证人：“很明显她将遇害”》（新闻报道，2016 年 5 月 6 日）。

¹⁵⁰ 《纽约时报》，〈贝尔塔·卡塞雷斯的继承人〉，作者约瑟夫·萨拉特 (Joseph Zárate)，2017 年 7 月 2 日，www.nytimes.com/es/2017/07/02/los-herederos-de-bertha-caceres/。

¹⁵¹ 国际特赦组织对贝莎·苏尼加的采访，2017 年 4 月。

¹⁵² 对“我们是捍卫者”组织的保护和协调员莱昂纳多·迪亚兹的采访，2017 年 8 月。

¹⁵³ 正如 2006 年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确认，强迫失踪是一种“持续性犯罪”，只要失踪者仍然失踪，而且国家没有就他们的命运或下落提供信息，该罪行就在发生。《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还将受害人定义为“任何因强迫失踪而受到直接伤害的个人”[第 24 条第 1 款]，并规定每个受害人都应有权了解“强迫失踪案情的真相，调查的进展和结果，以及失踪者的下落”，包括相关措施，以“查寻、找到和解救失踪者，若失踪者已经死亡，应找到、适当处理并归还其遗体”[第 24 条第 3 款]。

¹⁵⁴ 出于安全原因不透露详情。2017 年初的采访。

自由，并且教我我要成为坚强独立的女人，但突然间，没有了他的保护，我面对一个满怀敌意的社区。”拉尼姆自己在 2014 年曾被强迫失踪两个月，并遭受酷刑。¹⁵⁵ 一位挚友谈到了哈利勒遭强迫失踪的影响：“这件事让我极为担心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我对自己的行动、交谈的对象和我谈到的事都非常小心。他所有的朋友都受到了此事影响……对于我们来说，看着朋友消失，感觉就像政府恐吓叙利亚人民的一项大战略。”¹⁵⁶

被称为比利的**泰国**人权捍卫者**弗拉池·爱琼克乔伦**遭强迫失踪后，其妻子**平娜法·普鲁克萨潘**（Pinnapha Preuksapan）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她说：“比利走后，我立即变成了另一个人。生活一直很艰难，我不得不尽一切可能照顾 5 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¹⁵⁷ 平娜法一直争取查明比利的命运和下落，并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强迫失踪的认识。她说：“许多人要我停下来，远离（公园官员）。我可能会被杀。有人说如果不是女人，他们可能已经杀了我。但我会继续这样做，做法律允许我做的所有事情，直到诉讼结束。”¹⁵⁸ 2015 年，上诉法院驳回了平娜法提出对她丈夫的下落进行司法调查的要求，特别调查部在 2017 年决定不调查此案。同样，在人权律师**颂猜·尼拉派吉特**（Somchai Neelapaijit）于 2004 年遭强迫失踪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于 2015 年 12 月裁决，在没有证据证明他已死亡的情况下，他的家人不得代表他，也不能就法院做出的判决（针对颂猜·尼拉派吉特犯下的罪行）提出上诉。¹⁵⁹ 自 1980 年起，泰国多起悬而未决的失踪案例被提交给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这两起案件是其中的代表。由于泰国国内没有涉及强迫失踪和酷刑的法律，家属和公民社会团体难以在逆境、被骚扰和存在法律障碍之时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¹⁶⁰

3.2 对其他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的影响

其他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组织也可能承受心理创伤，并担心继续捍卫人权的话会遭到报复。他们可能不得不躲起来或逃跑，或停止有关敏感议题的工作，也可能会面临人手和组织方面的困难。

朱莉·伯克哈特（Julie Burkhart）是**美国**一名妇女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也是 2009 年遇害的**医生乔治·提勒**的同事。2015 年 12 月，3 名到科罗拉多州一家计划生育联合会诊所的人被杀，她在事发后讲述了自己和其他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如何持续遭受威胁。她亦表示，“一些人以肆无忌惮的言论来妖魔化堕胎服务工作者，并排斥那些希望使用堕胎服务的人，她被这些言论困扰。暴力和骚扰行为往往伴随此类言论而来。（提勒医生）被谋杀的事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已经筹划很久了。反堕胎团体多年来一直缠扰提勒医生，用耸人听闻的语言来将他妖魔化。其诊所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和家中也被人用激烈的手段恐吓，企图通过不停羞辱他们来让他们放弃工作。”¹⁶¹

人权捍卫者**比尔·布特罗斯**（Biel Boutros）是记者**伊萨亚·亚伯拉罕**（Isaiah Abraham）的朋友，亚伯拉罕因批评**南苏丹**政府而多次受到威胁，并于 2012 年 12 月被杀害。布特罗斯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如何通过开展运动的方式来回应此次袭击：“在他死后不久，我们首先发表新闻声明谴责他被暗杀的事件；我们写信给司法部长，写信给总统基尔（Kiir）。我们多年来发布新闻声明，要求该国付诸行动，就其声称因暗杀事件而逮捕了的那些人进行审判。国家骗了我们所有人，迄今为止没有人被追究责任。”2013 年 12 月，比尔为了安全不得不逃离南苏丹，因为“我其他捍卫人权的工作，加上我们要求为伊萨亚·亚

¹⁵⁵ 国际特赦组织，《监狱和坟墓之间：叙利亚的强迫失踪概况》（Between prison and the grave: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Syria）（索引号：MDE 24/2579/2015）。

¹⁵⁶ 国际特赦组织，《监狱和坟墓之间：叙利亚的强迫失踪概况》（索引号：MDE 24/2579/2015）。

¹⁵⁷ 《贝纳新闻》（Benar News），《泰国：3 名失踪男子的妻子谈及她们的伤痛》（Thailand: Wives of 3 Missing Men Discuss Their Grief），2016 年 12 月 19 日，www.benarnews.org/english/news/thai/forced-disappearance-12192016162703.html。

¹⁵⁸ 原住人权捍卫者网络（IPHRD Network），《泰国：“让爱永存”：与失踪的克伦活动人士爱人的谈话》（May ‘love last forever’: a talk with the love of a missing Karen activist），2017 年 4 月 18 日，<http://iphreddefenders.net/thailand-may-love-last-forever-talk-love-missing-karen-activist/>。

¹⁵⁹ 国际特赦组织，《泰国：司法界悲哀的一天，涉嫌重要人权捍卫者被强迫失踪案的警察被判无罪，家属被剥夺了共同原告权利》（索引号：ASA 39/3132/2015）。

¹⁶⁰ 国际特赦组织，《泰国：批准条约后国内必须采取行动来打击强迫失踪》（Thailand: Treaty ratification must be followed by domestic action to combat enforced disappearances）（索引号：ASA 39/5862/2017）。

¹⁶¹ 《时代杂志》，〈乔治·提勒医生的同事：计划生育联合会诊所枪击案是可怕的回忆〉，作者朱莉·伯克哈特，2015 年 12 月 1 日，<http://time.com/4131603/planned-parent-hood-reminder/>。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伯拉罕讨回公道，让我成为目标。目前，我和公民社会的一些同事正在逃亡，因为国家想要消灭我们。他们现在对我们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说我们支持叛乱者，是反对国家政策的特务，还指控我们是西方国家的间谍。我和我的家人身处险境，过去一年一直躲藏起来。”

比尔拒绝放弃，并说：“尽管有风险，但我们设法继续工作，因为保持沉默就意味着我们输了这场抗争，而国家赢了。我知道我们正对抗有资源、有势力的国家，但我们的精神使我们强大，因为我们不能背弃伊萨亚·亚伯拉罕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他说由于有罪不罚的缘故，“在南苏丹，今时今日对人权捍卫者的袭击已不再秘密进行，如果你针对侵犯人权行为说过一些话或写过一些东西，那么安全局人员就会找你，他们甚至还会打压流亡的维权者。有罪不罚显然已成为国家认可的现象。”¹⁶²

南非组织阿玛迪巴危机委员会反对在修罗贝尼的社区土地上露天开采钛和其他重矿物，该组织的创始人**诺赫勒·姆布修玛**说，她的同事兼朋友**西克霍希菲·“巴祖卡”·拉德比**在 2016 年被害的事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作为该委员会，同时作为朋友，我们极度悲痛……我们的挣扎是要继续工作，并且要大声疾呼。当我们谈论侵犯人权行为时，我们知道“他们在看着我们”。因此，人权捍卫者可能会害怕发声……此外，作为一名女人权活动人士，你总是在想着自己的孩子，我知道这很难，但你必须公开发声，为不公而抗争。我宁愿被枪杀，也不愿被沉默扼杀。我希望女性活动人士人数增加，而且更勇敢地针对侵犯人权行为公开发声。”她说，西克霍希菲·拉德比案的有罪不罚情况，导致她社区内的人多次受到袭击，而且“那些可能坏了政府形象的人……遭到袭击，他们的工作受到破坏。社区多次遭受恐吓，但即使他们向警方举报，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权，只在乎利益。”¹⁶³

在写到**修哈兹·曼南**和**曼赫布卜·拉比·托诺伊**于 2016 年遇害的事件时，同志（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权利活动人士塔*¹⁶⁴说，¹⁶⁵ **孟加拉国**的同志社区在恐惧之下沉默和躲起来。他说：“自我从另一名朋友那里了解（杀害事件）情况后，恐惧像是一只有着尖锐闪亮爪子、黑暗而丑陋的动物，一直骑在我的躯干上。”过去一年出现的恐惧氛围、有罪不罚现象和威胁，让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吓人的酒店搬到不知名的公寓，到大家都认识的朋友的住所，再到另一个国家……对我而言，家和家乡的定义在过去 12 个月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感到自己好像没有家了。”他觉得自己不能要求警方保护，因为孟加拉国的同志经常受到他们骚扰，而且他担心自己可能成为“调查”工作的一部分而遭拘押。他担心这些袭击可能会永远摧毁所有同志行动：“我们这些同志活动人士长期生活在威胁之下，但在谋杀事件发生后这些威胁变得更加凶险……在一年里，我的许多朋友因恐惧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可能终生不会回去。”

袭击令孟加拉国同志团体的活动完全停止，使取得的进展倒退了几十年。没有人因谋杀而被捕。在一个极端团体宣称对杀人事件负责后，内政部长称“（我们的）社会不允许任何运动宣扬不自然性行为。”这突显了当局对案件漠不关心。对塔来说，这给出了一个信号，“就像 2013 年以来倡导世俗主义的博客作者被杀案一样，政府官员似乎暗示我们自己招致了这样的局面。”为了避免遭受袭击，塔不得不自我审查，并终止了社交媒体上的所有活动。

在**印度尼西亚**的**慕尼尔·萨义德·塔里**遇害后，他在失踪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KontraS）的同事**乌斯曼·哈米德**（Usman Hamid）回忆说：“国内许多人权捍卫者感受到恐惧的氛围，因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杀害当时知名的慕尼尔，这意味着没有一位人权捍卫者是安全的。”乌斯曼·哈米德说，为了讨回公道，非政府组织就这起案件进行了倡导工作，却招来抹黑诽谤：“一些与保安部队关系密切的组织指控印度尼西亚人权非政府组织（包括慕尼尔在内）是‘叛徒’，因为它们从外国机构获得资金并揭露侵犯人权行为。这种抹黑诽谤旨在‘证明’有必要为保护国家安全而谋杀慕尼尔。”¹⁶⁶ 乌斯曼本人曾两次被列为刑事诽谤的嫌疑人，此举显然是要阻止他进一步开展行动。在印度尼西亚，犯刑事诽谤罪者可被判处最高达 5 年的监禁。

¹⁶² 对南苏丹人权倡议协会（South Sudan Human Rights Society for Advocacy）执行主任比尔·布特罗斯的采访，2017 年 7 月。

¹⁶³ 对阿玛迪巴危机委员会创始人诺赫勒·姆布修玛的采访，2017 年 7 月。

¹⁶⁴ *塔是化名，为保护作者而更改了真实姓名。

¹⁶⁵ 国际特赦组织，《修哈兹·曼南和曼赫布卜·拉比·托诺伊遭谋杀一年后》（One year after the murders of Xulhaz Mannan and Mahbub Rabbi Tonoy），作者为孟加拉国的同志活动人士塔*（博客文章，2017 年 4 月 25 日）。

¹⁶⁶ 对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分会主任乌斯曼·哈米德的采访，2017 年 8 月。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纳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 (Natalia Estemirova) 在 2009 年遭谋杀的事件, 对**车臣**的公民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寒蝉效应。在她去世后不久,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纪念碑”人权中心暂停了工作。她的妹妹**斯韦特兰娜·埃斯蒂米洛娃** (Svetlana Estemirova) 表示: “你一定是一名超级英雄, 才能在今时今日的车臣做这种工作。这里的人在惶恐之中生活……“纪念碑”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威胁, 而与家人离开了车臣。”¹⁶⁷ 车臣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的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该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并将车臣的人权状况描述为纳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谋杀案“发生前”和“发生后”。他们指出情况变得更糟, 许多维权者不得不逃离该国, 留在那里的人则遭受压力、恐吓和抹黑诽谤。

在这种氛围中, 人权组织车臣联合移动组织 (Joint Mobile Group for Chechnya) 在当局助长日益敌对之言论的情况下, 遭受了几次袭击。2014 年 12 月, 该组织的办公室在一场公开示威之后遭到纵火袭击, 示威者旗帜上称该组织是“恐怖主义支持者”。2015 年 6 月, 一些戴口罩的人强行进入该组织的办公室。在暴徒洗劫办公室期间, 警方没有回应人权捍卫者一再请他们介入的要求。前一天, 当局宣布举行会议, 以抗议人权捍卫者和独立媒体的“反车臣和反俄罗斯宣传战”。这些媒体不久前发表了报道, 指控车臣有严重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情况。¹⁶⁸

娜塔莉娅·埃斯蒂米洛娃的遇害也影响到其他人权遭受侵犯的人。俄罗斯人权捍卫者**塔妮亚·洛克什纳** (Tanya Lokshina) 说, 娜塔莉娅知道她面临的危险, 但仍然继续她的工作, 因为她知道她可以为人们带来真正的改变。但在 2009 年娜塔莉娅去世后, 当塔妮亚试图从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亲属那里了解并记录这些行为时, 人们会说: “走开, 你只会带来麻烦, 你甚至无法保护娜塔莉娅, 所以你认为你怎么来帮助我们?”¹⁶⁹

针对维权者的袭击也严重影响了与他们合作的人权团体的组织能力。哥伦比亚组织“我们是捍卫者”的**莱昂纳多·迪亚兹**指出, 杀人事件不仅对其他维权者构成威胁, 而且对人权组织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往往被迫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寻求保护 (以免受进一步袭击) 和忽视 (其他关键工作) 上, 从而达到行凶者的目的。”¹⁷⁰

3.3 将绝望化为实现变革的力量

上述案例和证词明确显示出杀害和强迫失踪事件对亲人和同事及社会上其他异议声音带来了深刻和灾难性的影响, 但这些事件有时还会产生其他影响, 使资深和新来的人权捍卫者都感到愤慨, 渴望修复创伤, 伸张正义和得知真相, 并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变革。

在国际正义使命团工作的**瓦迈塔·基马尼** (Wamaita Kimani), 是 2016 年在**肯尼亚**遇害的人权律师**威利·基马尼**的前同事。她说, 威利多年来在全国各地帮助的受害者经常提醒她威利留下的遗志。他的葬礼在内罗毕举行, 一名男子从距离 800 公里外的裂谷 (Rift Valley) 地区前来表达敬意, 并感谢威利·基马尼作为一位“足智多谋的专业律师, 是少数以尊重和礼貌的态度对待他的人之一”。在他去世后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也反映了这一点, 运动上有肯尼亚歌手朱利安尼 (Juliani) 制作的流行歌曲“昨日的泪水” (Machizi Ya Jana)。瓦迈塔说, 威利的去世“重新唤醒了勇气。我们的回应是, 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我们现在更加投入他曾参与的工作中, 受理更多有关追究警察责任的案件。”这场运动因而帮助公开更多的警察侵害案件, 帮助受害者克服害怕遭到报复和缺乏支持的问题。作为运动的一部分, 一个由 17 个组织组成的联盟目前正与一些与世隔绝的社区接触, 这些社区所遭受的警察侵害是其中一些最严重的。瓦迈塔对重新开展这行动充满希望: “我们与家属和受害者谈到现有的支持, 同时也和基层人权捍卫者交谈, 以便在社区层面帮助他们, 另外还有因侵害而遭受惊吓的家庭。”随着更多的人发声, 她希望这会成为“对警察问责的转折点, 实现真正和持久的转变”。¹⁷¹

¹⁶⁷ 对斯韦特兰娜·埃斯蒂米洛娃的采访, 2017 年 8 月。

¹⁶⁸ 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和前线卫士的联合声明, 《俄罗斯: 对车臣维权团体的袭击。调查暴民暴力; 保护活动人士》(Russia: Attack on rights group in Chechnya. Investigate mob violence; protect activists) (索引号: EUR 46/1804/2015)。

¹⁶⁹ 人权观察研究员对塔妮亚·洛克什纳的采访, 2017 年 9 月。

¹⁷⁰ 对“我们是捍卫者”组织的保护和教育协调员莱昂纳多·迪亚兹的采访, 2017 年 8 月。

¹⁷¹ 对国际正义使命团制度改革主任瓦迈塔·基马尼的采访, 2017 年 7 月。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尽管南苏丹仍持续出现侵害行为，但对**比尔·布特罗斯**来说，**伊萨亚·亚伯拉罕**的遇害“暴露了国家腐化，还有无能的安全人员忠于要人而不是为南苏丹人民服务。伊萨亚走到生命尽头时仍然无畏无惧，他所展示的勇气仍鼓舞我们大家，一直推动我们前进。我本人拒绝保持沉默，因为如果我们对他献身的问题袖手旁观或自称中立，将会大大地背弃他对其他国家的承诺和热爱……伊萨亚激励我们去鼓舞他人，为那些遭到国家人员压迫的人大声疾呼。我一直受到他的勇气和决心所鼓舞……伊萨亚为我，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家族，为他的国家而死，他的死代表着弱势者的牺牲。当局应该认识到人民力量比当权者更加强大……无论是否有风险，我们都必须公开发声，而且关键是彼此之间在精神上相互支持……国际社会应继续向流亡中和在国内的人权捍卫者提供精神和经济支持。”¹⁷²

巴西帕拉州 (Pará state) 的人权捍卫者克劳黛丽丝·席尔瓦·多斯桑托斯 (Claudelice Silva dos Santos) 是**胡塞·克劳迪奥·里贝罗·达席尔瓦 (José Cláudio Ribeiro da Silva)** 的妹妹和**玛丽亚·杜艾斯皮里托·桑托·达席尔瓦 (Maria do Espírito Santo da Silva)** 的小姑。达席尔瓦夫妇是环境和土地捍卫者，在屡次谴责非法伐木者和养牛牧场主入侵他们社区的保留地后，于 2011 年遇害。¹⁷³ 克劳黛丽丝认为，她的哥哥和嫂子在保护土地使用权和环境方面的工作对于其他活动人士来说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他们是最先了解这些侵害行为严重性的人，并且知道人们需要做些事。他们知道，当我们的朋友遇害而且环境遭到破坏时，袖手旁观是不对的……在他们杀害了克劳迪奥和玛丽亚后，我们觉得有需要继续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他人和环境。我们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教育工作，从克劳迪奥和玛丽亚的故事开始讲起，然后我们谈到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人们的参与非常重要……我们非常需要捍卫这些权利和环境的人。在巴西，如果一个领导者为人权抗争，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杀了他，因为他们知道可以逍遥法外，行凶者不会有事……因此，自然环境需要捍卫者，我们也需要保护。”¹⁷⁴

乌斯曼·哈米德说，在**印度尼西亚的慕尼尔·萨义德·塔里**遇害后，“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以他被谋杀一事，使人们认识到有需要更好地保护人权捍卫者。他们倡议并致力于设立专门保护人权捍卫者的新法律。在游说立法者之后，他们成功提出关于保护人权捍卫者的法律草案，被纳入立法议程中。但迄今为止，立法者尚未就该法律草案进行讨论和辩论。此外，国家人权委员会 (Komnas HAM) 还设立了一个关于人权捍卫者的特别工作组。慕尼尔于 2004 年被谋杀一事唤醒了所有印度尼西亚维权者……自此以后，他们一直在重新思考自己可能因人权工作而面临的威胁和风险，并开始制定战略来缓解这些威胁和风险，而且互相联系交流起来，以便让更多的人参与实施这些战略。”¹⁷⁵

印度旁遮普 (Punjab) 的人权捍卫者贾斯沃特·辛格·哈拉 (Jaswant Singh Khalra) 在 1995 年遭强行失踪、酷刑和杀害。经过了 10 年的时间，才有 6 名警察因绑架和杀害他而被定罪；但没有任何高级别的警察被绳之以法。贾斯沃特·辛格·哈拉记录了 1984 至 1994 年期间数以千计的锡克教教徒遇害和强迫失踪的案件，并迫使当局调查这些侵害事件并承担责任，但能讨回的公道和得到的补偿有限。他的工作使新的人权捍卫者继续幸存者的斗争。他的遗孀**帕拉米基特·考尔 (Paramijit Kaur)** 说：“人权捍卫者有责任收集数据。如果你能够记录旁遮普的失踪者人数，我相信这将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到那时，我相信贾斯沃特·辛格·哈拉的工作将会得到巩固，并表明他所说的是正确的。”¹⁷⁶

墨西哥媒体和记者利用自我审查或匿名发表文章的策略，以避免成为暴力报复的目标，特别是在报道关于犯罪网络、腐败和滥用力量的问题时。但墨西哥记者**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 (Anabel Hernández)** 称，匿名发表文章未能有效保护记者。她注意到，在过去的 10 年中，新一代记者公开挑战现状，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发布他们的故事。她说：“他们在积极打破沉默的壁垒，对我而言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抗争。”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以报道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而闻名，自 2010 年起因反复遭到威胁和袭击，而一直受到警方保护。但她认为，要减少墨西哥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无数其他人遭受的暴力行为，关键是解决有罪不罚现象盛行的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包括记者和维权者）近几年在墨西哥遇害。在墨西哥，所有类别的犯罪中，平均有 98% 的罪犯不受惩罚。我受到了警方最高级别的保护，但

¹⁷² 对南苏丹人权倡议协会执行主任比尔·布特罗斯的采访，2017 年 7 月。

¹⁷³ 国际特赦组织，《巴西：当局必须采取行动遏止亚马逊区域各地的杀害事件》(Brazil: Authorities must act to stop killings across the Amazon) (索引号：AMR 19/008/2011)。

¹⁷⁴ 对克劳黛丽丝·席尔瓦·多斯桑托斯的采访，2017 年 6 月。

¹⁷⁵ 对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分会主任乌斯曼·哈米德的采访，2017 年 8 月。

¹⁷⁶ 恩萨夫组织 (Ensaaf) 2015 年为制作《正义之光：纪念贾斯沃特·辛格·哈拉》(A Light of Justice: Commemorating Jaswant Singh Khalra) 而对帕拉米基特·考尔的采访，欲观看视频，请访问：www.ensaaf.org/programs/legal/khalra/。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无论我有多少保镖，仍然有人不断威胁我，试图杀了我。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那些对袭击负责的人逍遥法外。对于所有公民而言，最好的保护是结束有罪不罚现象。”¹⁷⁷

¹⁷⁷ 对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的采访，2017年9月。

4. 防止更多袭击：确认模式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杀害和强迫失踪等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袭击很少是突然而来，而往往是一系列威胁、抹黑、监视、人身袭击和各种迫害不断升级的结果。每次袭击都是对人权捍卫者的警告，要他们停止其人权工作并保持沉默。维权者面临严峻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继续进行其合法和必要的工作，就有可能遭受极端形式的报复。这种行动升级必须从整体上看，并在考虑到每名维权者的背景和个人情况后，评估其代表人身安全受威胁的程度。

以下是此类事件升级的例子。它们是“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如果当局重视人权捍卫者所起的根本和合法作用，并采取必要步骤防止袭击发生，本来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人命损失。

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成员被袭击



贝尔塔·卡塞雷斯的追悼会，也是2016年“为贝尔塔伸张正义”全球行动的一部分。©国际特赦组织

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兼环境、原住民及妇女权利捍卫者**贝尔塔·卡塞雷斯**在2016年3月遇害时，知道自己是首要暗杀目标。尽管她在国际上享有声望，并得到全球各地的人声援，但对她的威胁没有受到调查，之前袭击她的人仍逍遥法外。涉及的经济利益巨大，与瓜尔克切河（Gualcarque River）上的阿瓜扎卡（Agua Zarca）水电项目建设有关。公共检察官办公室最初声称贝尔塔·卡塞雷斯被杀案是“抢劫”或“激情犯罪”，之后调查了她牵头反对阿瓜扎卡水电项目的活动。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到目前为止，当局已经确认并拘押了 8 名嫌疑人，其中包括拥有该项目的洪都拉斯能源发展公司（DESA）的一名经理、一名现役军官；以及一名为项目提供保安服务的前军官。¹⁷⁸ 公共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他们将被视为可能实质策划犯罪的人，但迄今为止，我们未能确定当局是否取得任何进展，查明和起诉那些策划和买凶杀人的人。¹⁷⁹

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成员受到侵害的态势由来已久，其中包括针对贝尔塔及其同事的数十起死亡威胁，另外还有人身袭击和威胁、不公起诉和监禁。2013 年，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托马斯·加西亚·多明格斯**（Tomás García Dominguez）遇害，他的儿子受伤。同年，贝尔塔·卡塞雷斯被指控携带一支未经注册的枪，但她称那是检查站的军官栽赃陷害她。几个月后，指控被撤销，但这一事件削弱了她进行和平合法工作的能力，并破坏了她的声誉。当该案最终被驳回时，贝尔塔·卡塞雷斯受到的袭击也变得越来越暴力。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她接到电话和短信，威胁要让她及她的儿女消失或绑架他们。2015 年 11 月，她乘坐的一辆汽车遭到枪击。2016 年 2 月 16 日，贝尔塔和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遭到武装男子跟踪，几天后，他们乘坐巴士前往参与和平游行途中被截停。

洪都拉斯当局长期以来一直知道贝尔塔·卡塞雷斯遭到威胁：美洲人权委员会曾要求为她和其他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成员提供保护措施，但该国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而且当局也没有对大多数事件进行适当调查。即使她的死令国际社会震惊不已，但袭击仍然继续发生，其中包括多起骚扰、恐吓、威胁和监视事件，例如在 2017 年 6 月，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汽车遭到武装袭击，当时车上有维权者**贝莎·苏尼加·卡塞雷斯**（Bertha Zúniga Cáceres）、**索特罗·查瓦利亚·弗奈兹**（Sotero Chavarría Fúnez）和**何塞·亚松森·马丁内斯**（José Asunción Martínez）。¹⁸⁰ 这些袭击和骚扰被广泛认为企图阻止洪都拉斯民众与原住民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工作。¹⁸¹

危地马拉：环境、社会和法律行动中心成员被袭击



环境、社会和法律行动中心的杰里米·亚伯拉罕·巴里奥斯·利马 © 私人所有

在危地马拉，**环境、社会和法律行动中心**（Centro de Acción Legal, Ambiental y Social de Guatemala）的人权捍卫者着力保护环境权利，并谴责该国矿业公司的侵害行为。也由于此，他们一直是遭受无情的报复性袭击，包括被抹黑诽谤、被闯入、收到死亡威胁，以及被企图暗杀。2008 年，蒙面男子枪击了危地马拉环境、社会和法律行动中心的主任**尤里·梅利尼**（Yuri Melini），使他身受重伤。2011 年 8 月，尤里·梅利尼和该中心的法律顾问**拉斐尔·马尔多纳多**（Rafael Maldonado）收到含有威胁的信封。2013 年 3 月和 4 月，拉斐尔·马尔多纳多的家遭人闯入，2015 年，他又数次受到威胁和恐吓。

¹⁷⁸ 国际特赦组织，《“我们以自己的血汗捍卫土地”：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土地、领土和环境捍卫者》（索引号：AMR 01/4562/016）。

¹⁷⁹ 国际特赦组织，《洪都拉斯：为贝尔塔·卡塞雷斯谋杀案伸张正义的进程受威胁》（索引号：AMR 37/6335/2017）。

¹⁸⁰ 国际特赦组织，《COPINH 成员受到武装袭击》（Armed attack against members of COPINH）（索引号：AMR 37/6674/2017）。

¹⁸¹ 国际特赦组织，《“我们以自己的血汗捍卫土地”：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土地、领土和环境保护者》（索引号：AMR 01/4562/2016）。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2016年11月，他们的同事**杰里米·亚伯拉罕·巴里奥斯·利马**（Jeremy Abraham Barrios Lima）遇害，他曾处理一些广受关注之案件的敏感信息。¹⁸²

环境、社会和法律行动中心的成员已屡次遭到抹黑诽谤。一份 2013 年发布的小册子指控他们安排散布关于矿业公司的不实消息，¹⁸³ 助长了原住民和这些公司之间的冲突，并威胁到危地马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¹⁸⁴ 2017 年 6 月，全国报纸上出现了另一起抹黑该中心的事件，当时一家采矿公司将他们标签为“反对者”和“操纵者”，并在他们质疑该公司的执照后指控他们煽动冲突。¹⁸⁵ 尤里·梅利尼在接受警方保护，但那些暴力袭击他的人没有被绳之以法。

布隆迪：皮埃尔·克莱弗·博因帕和其他人受到袭击



保护人权和被拘留者协会的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 © Jean Pierre Aime

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Pierre Claver Mbonimpa）是**布隆迪**最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之一，2015 年 8 月，他在下班回家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枪手击中面部。他虽然死里逃生，但必须接受手术和漫长的康复过程。在事发前的一段时间，已经有人担心他可能会遭到暗杀。

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在 1994 至 1996 年期间遭到酷刑和非法监禁后，成立了**保护人权和被拘留者协会**（Associa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Humains et des Personnes Détenues）。2009 年，调查布隆迪警察腐败问题的人权捍卫者**欧内斯特·马尼鲁姆瓦**（Ernest Manirumva）遇害，但行凶者却逍遥法外。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和其他活动人士针对以上事件不受追究的问题发起运动，但却一再受到威胁。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在布隆迪一家电台上发表评论，称有年轻人在非法接受军事训练和装备，之后于 2014 年再次被捕。他在几个月后因健康原因获释，但在 2015 年 4 月又被短暂拘捕，这和政府镇压公民社会对总统恩库伦齐扎决定寻求第三个任期的抗议有关。¹⁸⁶ 此次镇压还导致其他几位人权捍卫者成为袭击目标，包括人权组织“布隆迪人权联盟”（Ligue Iteka）的成员**玛丽·克劳德特·基塞拉**（Marie Claudette Kwizera），她自 2015 年 12 月起便下落不明，据信遭到情报部门强迫失踪。

¹⁸⁷

¹⁸² 国际特赦组织，《年轻人权捍卫者遭枪杀》（Young human rights defender shot dead）（索引号：AMR 34/5144/2016）。

¹⁸³ 由反恐基金会（Fundación contra el Terrorismo）出版，该团体由前军官和军方支持者成立。有关该基金会的小册子可在此查阅：<http://en.calameo.com/read/00263395139ff1c0b62ae>。

¹⁸⁴ 前线卫士，《4 家全国报纸发布诽谤人权组织环境、社会和法律行动中心的文章》（Defamatory article against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CALAS published in four national newspapers），2013 年 7 月 2 日，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case-history-calas#case-update-id-2726。

¹⁸⁵ 国际特赦组织，《针对环保人士的抹黑诽谤》（Smear campaign against environmental defenders）（索引号：AMR 34/6680/2017）。

¹⁸⁶ 国际特赦组织，《布隆迪：人权活动人士被枪击的事件增加恐惧氛围》（Burundi: Shooting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 increases climate of fear）（新闻稿，2015 年 8 月 6 日）。

¹⁸⁷ 国际特赦组织，《要求布隆迪处理有罪不罚问题》（Calling out Burundi on impunity）（新闻，2017 年 7 月 21 日）。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在发生暗杀未遂事件后，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的几名家人受到威胁和监视。2015年10月，当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在国外养伤时，他的女婿**帕斯卡尔·恩希米里马纳**（Pascal Nshimirimana）遭安全部队杀害。一个月后，他的儿子**威利·弗勒里·恩兹通达**（Welly Fleury Nzitonda）也被安全部队杀害。据信他们被谋杀的事与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及保护人权和被拘留者协会的人权工作有关。¹⁸⁸

皮埃尔·克拉弗·博因帕目前正在流亡。其他许多布隆迪人权捍卫者和记者也因暴力或暴力威胁，以及当局用抹黑诽谤、恐怖主义和反腐败的法律来压制他们，以致他们不得不为自身安全而逃离该国。

俄罗斯联邦：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和其他人受到袭击



纪念碑人权中心的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 © 国际特赦组织

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和**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在俄罗斯联邦遇害的事反映了一个类似模式，显示当局没有关注人权捍卫者受到的威胁。

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是一位著名记者，从1999年起便为《新报》（Novaya Gazeta）报道车臣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她还撰写了有关俄罗斯其他地方出现侵害行为的文章，包括军队侵犯人权、国家机构腐败和警察侵权。由于她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和车臣冲突，因此受到俄罗斯和车臣当局的恐吓与骚扰。她自2001年开始撰写文章并开展运动，抗议泽利姆汗·穆尔达洛夫（Zelimkhan Murdalov）这名来自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学生遭强迫失踪的事件，并因此遭到威胁。她因为报道其他事件而受到任意拘押，并被威胁会受到严厉报复，包括2004年在时任总理和后来的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家中被拘押了几小时，期间受到辱骂和威胁。2004年9月，她在前往北奥塞梯报道别斯兰人质危机的途中生病，并认为自己在航班上被下毒。2006年10月，她在莫斯科所住的公寓楼里被枪杀。虽然有些对凶案负责的人目前在服刑，但下令谋杀她的人仍逍遥法外。¹⁸⁹

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是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重要人权捍卫者，曾与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密切合作。她从2000年开始便在纪念碑人权中心工作，搜集证人证词以记录第二次车臣冲突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涉及泽利姆汗·穆尔达洛夫的强迫失踪案中，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与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一起将一名犯罪者绳之以法。即使在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被杀后，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仍继续搜集有关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和酷刑的信息，并致力于在车臣落实社会及经济权利与妇女权利。2009年7月，在她向媒体谈到另一起强迫失踪事件和一起据称是法外处决的案件后，有官员告诉她，她的评论让当局不高兴，也同时使她面临危险。同一个月，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被发现死亡。

¹⁸⁸ 国际特赦组织，《要求布隆迪处理有罪不罚问题》（新闻，2017年7月21日）。

¹⁸⁹ 国际特赦组织，《俄罗斯：杀手因谋杀记者被判刑》（Russia: Assassin sentenced for journalist murder）（新闻稿，2012年12月14日）。

目击者称，一些武装男子在她的公寓外绑架了她。然而，此案的调查没有处理当局可能参与杀害她的问题，且凶手仍逍遥法外。¹⁹⁰

4.1 承认和保护人权捍卫者的责任

国家负有保护人权捍卫者的最终责任，并确保他们能在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中开展合法工作。¹⁹¹ 该义务还要求国家执行必要措施，以防止和有效处理据称侵犯人权捍卫者人权的行，并确保他们能够开展合法工作，而不需担心会遭受报复。然而，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袭击显然经常发生，这正正是因为国家未尽力营造一个安全和有利的环境。国家往往没有承认和有效保护面临风险的维权者，也没有追究侵害者的责任。当涉及这些袭击的人一直逍遥法外时，当局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这种行为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几乎或完全没有任何后果。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要求各国尊重和保护其司法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生命，使其免受袭击和袭击威胁，并在未能给予保护的情况下提供有效补救措施。¹⁹² 生命权是充分实现人的尊严和切实行使所有人权的先决条件，¹⁹³ 该权利规定国家及其代理人不仅有义务避免参与任何任意杀人行为，而且还要保护人们免受非国家行为体的此类威胁。¹⁹⁴

保护生命权也意味着国家有促进这一权利的积极义务，其中包括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死亡事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规定，为保障该《公约》承认的所有权利，国家承诺采纳所需的法律或其他措施来落实这些权利。若国家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侵犯生命权，包括未采纳必要的法律和做法，就有可能再次违反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之下承担的义务。此外，当国家没有防止此类侵害行为持续和再次发生时，也违反了其在国际人权法之下承担的义务。¹⁹⁵

当国家官员知道一个或多个已确认身份的人受到威胁，或因共同的合法活动或身份而互有关联的人被杀而且他们的被杀方式存在特定的模式时，情况尤其如此。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重申了人身安全权和生命权的相关性，并特别强调国家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对公共场所人员受到的死亡威胁做出反应，通常是保护个人免受可预见的来自任何政府或私人的生命或身体完整威胁。”¹⁹⁶ 这包括需要采取措施，打击针对人权捍卫者和记者等某些类别人士的暴力态势。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各国公开承认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并承认其工作的合法性非常重要，这也是国家防止人权捍卫者遭受袭击的义务的一部分。国家公开承认人权捍卫者可有效降低风险水平，并防止威胁成为事实。¹⁹⁷ 特别报告员尤其呼吁各国提高大家对人权捍卫者的合法和关键工作的认识，并公开支持他们的工作，包括女性人权捍卫者发挥的特殊和重要作用。

国家还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来防止强迫失踪发生，并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查，以确定可能遭受强迫失踪的人的命运和下落。当局必须及时向家属提供机会，让他们说出其所了解的情况，以便为调查出一分力，同时亦须充分和迅速向他们通报调查的进展。

¹⁹⁰ 国际特赦组织，《俄罗斯联邦：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因她对入权的承诺而难以遗忘》（Russian Federation: Natalia Estemirova - unforgotten in her commitment for human rights）（索引号：EUR 46/026/2010）。

¹⁹¹ 《人权维护者宣言》，第 2 条。

¹⁹² 《世界人权宣言》，第 3 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美洲人权公约》，第 4 条；《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4 条；《阿拉伯人权宪章》，第 5 条。此外，生命权已被确认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项规则。参阅《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12 年 8 月 9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67/275，第 105 段。

¹⁹³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12 年 8 月 9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67/275，第 11-12 段。

¹⁹⁴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12 年 4 月 10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20/22，第 42 段。

¹⁹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2004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CCPR/C/21/Rev.1/Add.13，第 17 段。

¹⁹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人身自由和安全）》，2014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CCPR/C/GC/35，第 9 段。

¹⁹⁷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13 年 12 月 23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25/55，第 86 段。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若有人生命权遭到侵犯，国家必须确保向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可利用、有效和可执行的补救措施。¹⁹⁸ 国家必须确保由独立公正的机构迅速进行彻底和有效的调查，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¹⁹⁹ 尤其，针对人权捍卫者遇袭事件的调查必须确定袭击是否与其人权工作有关，并应考虑维权者死后谁可能从中受益。国家不仅要确定实际行凶者的身份，还要查明可能的谋划者。²⁰⁰

如调查发现某人的死是非法的，国家必须通过起诉凶手确保追究责任，并在适当情况下通过公正审判施加适当的制裁。当局必须对非法杀人事件迅速进行公正、有效的调查，而调查机构不得受到据称对事件负责的人支配，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资源来进行调查。²⁰¹ 特别调查单位（如涉及人权捍卫者或记者的调查单位）可以成为重要工具，以确保迅速进行调查，并避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当影响。²⁰² 若当局未有效起诉和制裁涉及人权捍卫者遇袭事件的人，将会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些行为是可以容忍的，还会增加其他人权捍卫者和欲讨回公道的家属的风险。

国家有义务向人权受到侵犯的人提供适当补偿，视乎情况而定，其中应包括赔偿、康复、满足要求的措施和保证不重犯。²⁰³ 有关不重犯的保证应包括一系列措施，专门用来处理各种情况下国家失职的问题，以防未来重蹈覆辙。在一名危地马拉人权捍卫者被杀案中，美洲人权法院下令该国执行一项保护人权捍卫者的公共政策，以作为不重犯的保证。²⁰⁴

更广泛而言，国家被要求执行公共政策和具体的机构机制，以便为有危险的人权捍卫者提供有效保护。²⁰⁵ 一些国家已通过法律并建立了国家保护机制，为人权捍卫者和其他有危险的群体提供保护和预防措施；其中包括**巴西、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²⁰⁶ 然而，这些国家执行不力的问题，突显了确保公民社会参与起草和执行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分配足够资源的需要。²⁰⁷

在制定保护机制时，应当让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并和他们协商。要保护措施有效，国家必须确保在制定这些措施时进行全面的风险分析，并纳入性别观点，以充分查明每个维权者或团体的风险和
保护需求。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遭受不同形式歧视的人权捍卫者及面临更大风险者的具体需要，而且努力查明袭击的根源。

重要的是，国家应与人权捍卫者合作，追踪调查涉及安全的事件、评估威胁，并采取适当行动，包括追究责任，以减低风险并防止更多袭击发生。此外，搜集尽可能多有关威胁来源、动机和发生背景的信息也非常重要。

¹⁹⁸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2004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CCPR/C/21/Rev.1/Add.13，第 15 段。

¹⁹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2004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CCPR/C/21/Rev.1/Add.13，第 15-18 段。

²⁰⁰ 美洲人权法院，阿库斯塔 (Acosta) 等人诉尼加拉瓜案，2017 年 3 月 25 日。

²⁰¹ 人权高专办，《关于或属非法致死事件调查的明尼苏达规程》（2016 年），纽约/日内瓦，2017 年。

²⁰²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12 年 4 月 10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20/22，第 113 段。

²⁰³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2004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CCPR/C/21/Rev.1/Add.13，第 16 段；《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审即决事件的原则》，第 20 条原则；《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 4 条原则。

²⁰⁴ 美洲人权法院，人权捍卫者等人诉危地马拉案，2014 年 8 月 28 日，第 263 段。

²⁰⁵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13 年 12 月 23 日，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25/55，第 84 段。

²⁰⁶ 其他一些国家已通过或正在讨论立法，目的是保护人权捍卫者，其中包括布基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马里、蒙古和塞拉利昂。

²⁰⁷ 保护国际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2014 年焦点》，<http://protectioninternational.org/publication/focus-2014/>。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国际特赦组织

《人权捍卫者认可及保护示范法》

现时可用于设立有效保护法和机制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国际人权服务社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在征求了数百名人权捍卫者和专家的意见后,于2016年6月推出的《**人权捍卫者认可及保护示范法**》(Model Law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该《示范法》通过提供技术指导,教导国家设立适当的法律、政策和机构,以支持维权者的工作并保护他们免受报复和袭击,从而向各国提供关于如何在国家层面实施《人权维护者宣言》的权威性指导。该《示范法》载有重要说明,显示国家有义务对侵犯维权者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考虑侵害动机是否“包括(人权捍卫者的)身份、活动或作为人权捍卫者而进行的工作;……之前是否曾发生过侵害……或类似处境的人权维护者被有系统地侵犯权利的行为;以及……是否由多方实施、帮助、教唆或支持侵害行为。

该《示范法》还就保护机制可如何运作提供了一系列指示,包括纳入性别观点的全面风险分析,并考虑到遭受不同形式歧视及更大风险的人权捍卫者的具体需要,而且查明侵害的根源。

此外,该《示范法》还强调以下措施对认可和支持人权捍卫者的工作,以及**防止**恐吓或报复行为的重要性,包括:

- **发表公开声明并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人权捍卫者的重要和合法工作;
- **追踪调查**恐吓或报复行为,以搜集和整理有关数据并编写调查报告;
- **确认侵犯**人权捍卫者的**模式**;
- **打击歧视、污名化或抹黑诽谤**人权捍卫者的行为。²⁰⁸

²⁰⁸ 国际人权服务社,《人权捍卫者认可及保护示范法》,
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odel_law_full_digital_updated_15june2016.pdf。

5. 结论和建议

由于人权捍卫者的生命和身心完整在世界各地继续受到威胁，各国事实上没有尽到义务来尊重和保护生命权，以及人们在不用担心报复的情况下捍卫人权的权利。有罪不罚现象持续；而且，侵害的风险和模式并未得到评估，以致无法为预防战略和行动的制定提供信息；再加上保护身处险境之人权捍卫者的机制执行不力或并不存在；以上种种造就了更多袭击的机会。社会普遍对人权捍卫者的合法工作缺乏了解和认可，在某些情况下当局和其他行为体甚至作出直接威胁和怀有敌意，而暴力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往往发生在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袭击后，其中包括抹黑诽谤和污名化、不公起诉和任意拘押、威胁和恐吓，以及其他暴力行为。若能根据具体背景和工作领域对风险进行分析，包括与交叉歧视形式相关的脆弱因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袭击模式，并通过预防战略加以应对。

袭击事件对家人和朋友、其他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并对广泛社区产生涟漪效应，妨碍人权和法治的保护。采取行动防止和补救这种严重损害，不仅是各国在国际人权法之下承担的义务，而且应是政策优先事项。

国际特赦组织向各国提出以下建议作为一个起点，以确保为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营造一个安全和有利的环境。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各国：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人权捍卫者遭受威胁和袭击，包括杀害和强迫失踪，方式是：

- 明确承认人权捍卫者的合法性，并公开支持他们的工作，承认他们对促进人权的贡献，包括开展关于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宣言》、人权捍卫者的作用和合法工作的公共宣传运动；
- 公开承认遭受歧视的女性人权捍卫者和其他人权维护者所发挥的作用，并确保她们能在没有暴力和歧视的环境中工作；
- 颁布和执行承认并保护人权捍卫者的法律；并废除或修改可能阻碍合法活动的法律，以促进和捍卫人权；
- 在法律和实际上确保人们能行使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 公开谴责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袭击、威胁和恐吓，并避免使用污蔑、辱骂、贬损或歧视他们的语言；
- 追踪和处理可能与人权捍卫者的职业、身份或其他危险工作环境相关的威胁和袭击态势。

确保提供一个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使人权捍卫者得到有效**保护**，并能在不担心

遭到惩罚、报复或恐吓的情况下捍卫和促进人权。尤其是：

- 在与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组织协商的情况下，为面临风险的维权者建立国家保护机制，该机制应纳入预防性、集体和具性别敏感性的方法，利用与受影响的人权捍卫者商定的保护方法；
- 在颁布保护人权捍卫者的法律和机制时，于公民社会中建立参与性程序，让在农村地区或社区为主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权捍卫者参与；
- 帮助设立支持和保护人权捍卫者的国家和区域网络；
- 确保面临歧视的女性人权捍卫者和其他人权捍卫者获得所需的具体保护，让她们免受威胁和暴力对待，并承认她们面临的特殊挑战和风险；
- 加强国家人权机构，为其提供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使其能有效履行职责，当中包括保护人权捍卫者的具体任务。

通过有效**调查**人权捍卫者遇袭的事件，例如被杀害和强迫失踪，终结有罪不罚和暴力循环，方式是：

- 通过彻底、迅速和独立调查袭击，并以公正审判将嫌犯绳之以法的方式，有效应对人权捍卫者遭受威胁、骚扰、恐吓、杀害和强迫失踪事件；
- 确保调查考虑到人权捍卫者的人权工作可能是袭击动机；
- 如果尚未成为《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就应立即加入该《公约》，并颁布法律，根据该《公约》将强迫失踪定为违反国家法律的犯罪；
- 承认遭受杀害或强迫失踪的人权捍卫者的亲属，并允许他们参与调查，就调查进展向他们提供最新和准确的信息，并确保他们能够提供信息、提出调查建议并要求取得证据。当局不应将调查案件的责任转交给家属。

确保人权遭侵犯的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可获得有效补救和适当**补偿**：

- 确保根据国际标准为受害者提供适当补偿，并考虑受害者的个人需求，包括复原、赔偿、康复、满足措施和保证不重复。
- 确保补偿不以犯罪人接受刑事诉讼为条件。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
全球性的人权运动。
当一人遭遇不公义的事
情，都与我们所有人
息息相关。**

联系我们



lianxi@amnesty.org

加入讨论



www.facebook.com/AmnestyChinese



[@AmnestyChinese](https://twitter.com/AmnestyChinese)

可预防的致命袭击

人权捍卫者遭到杀害和强迫失踪

那些在全球各地捍卫人权的人让自己处于十分危险的处境。他们因自己的合法活动而面临骚扰、恐吓、不公起诉甚至死亡的风险。

本报告聚焦于对人权捍卫者的最严重侵犯行为：杀害和强迫失踪。一些人因为挺身对抗侵犯人权的强大势力而遭到袭击，其他人则因自己的身份和活动而遇袭，例如捍卫妇女权利的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以及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其他人在冲突期间或社区受到有组织犯罪控制和暴力镇压时遭到袭击。

自从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宣言》在 1998 年通过以来，数以千计的人遭受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杀害和强迫失踪。本报告显示，如果各国认真履行其人权义务，并在收到有关威胁和其他侵害的举报时全力采取行动，本来可以防止大多数袭击发生。在全球众多的国家，当人权捍卫者遭到威胁时，当局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此类袭击造成涟漪效应，触及到朋友、家人、其他人权捍卫者以及整个社会。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呼吁为人们提供保护、伸张正义及对其所受的伤害作出适当补偿，并敦促各国政府公开发出明确信息，表明不会容忍这些侵害行为。

这是国际特赦组织就名为“勇敢”（Brave）的全球运动发布的第二份报告，旨在对有权有势者威胁和袭击人权捍卫者的手段进行反击。